

## 從《閱微草堂筆記》中之儒者形象 看紀昀的治學趨向

王鵬凱\*

### 摘 要

被魯迅稱為「前清的世故老人」紀昀，對他所贊同或反對的意見，往往很「世故」地「托狐鬼以抒己見」（魯迅語），紀昀常藉著鬼狐或是他人之口或抨擊或諷刺或讚揚眾儒者，透過這些故事的描繪，可以去探索紀昀內心一些未曾言明的想法，去瞭解他治學的趨向究竟為何。因此從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所刻劃的儒者形象，可以看出紀昀對當時儒者讚許與厭惡為何。從愛憎之中，可以得知紀昀對漢宋學的態度為何，同時也體現了他心中的治學標準為何。經過探析之後，可以看出，就通經的方法而言，紀昀崇漢學考據方法的實；而黜宋學空談先天、心性之虛，這是紀昀在治學方法上和程朱理學的立異處。他欣賞的是漢學重考據徵實的治學方法，但是透過考據的方法來明瞭經典的真意（通經），最終的目的還是在於落實到經國濟世的「致用」上，如果只是沉湎於復古，導致泥古而食古不化，成為迂腐的學究，甚至陷入繁瑣的考證弊病當中，紀昀也會毫不客氣地給予辛辣的諷刺。正因為如此，紀昀重視通經致用的治學態度並不同於當時偏重於考據方法的漢學，只能說他是趨向漢學的治學態度，但不以漢學為藩籬。再則，紀昀治學方法雖和程朱理學立異，但他仍能承認宋儒之長，也寫出講學家德性醇然真君子的形象，且有諸多消融門戶之見、力求公允之論的主張，以及對漢宋學短長的持平之論，可惜的是人們對此卻未注意。要言之，紀昀治學趨向為：趨向漢學的治學態度，但不以漢學為藩籬、攻訐程朱理學末流之弊，是對程朱理學的修正，而非反對程朱理學，並主張消融門戶之見，持公允之論。雖然他儒者

---

\* 南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講師。

形象的描寫是相當成功，但他主張消融門戶之見的意見卻未獲得重視，但仍不失為「穴結」時代的代表人物。

**關鍵詞：**閱微草堂筆記、紀昀、儒者形象

## 壹、前言

《閱微草堂筆記》是紀昀（1724-1805）晚年的文學代表作，包含了《灤陽消夏錄》六卷 290 則、《如是我聞》四卷 248 則、《槐西雜志》四卷 277 則、《姑妄聽之》四卷 210 則和《灤陽續錄》六卷 147 則等五種，共 1172 則<sup>1</sup>。他從乾隆己酉年（1789）夏到嘉慶戊午年（1798）夏陸續寫成，前後共歷時九年。嘉慶庚申年（1800），紀昀門人盛時彥為之校訂合刊，定名為《閱微草堂筆記》。雖然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的序中一再謙稱該書「今老矣，無復當年之意興，惟時拈紙墨，追錄舊聞，姑以消遣歲月而已」<sup>2</sup>、「景薄桑榆，精神日減，無復著書之志，惟時作雜誌，聊以消閒，《灤陽消夏錄》等四種，皆弄筆遣日者也。」<sup>3</sup>是消遣歲月的作品，但在景薄桑榆、精神日減、垂垂老矣的暮年，願意耗費近十年的歲月創作此書，不會僅僅是為了弄筆遣日而已，紀昀自己也說「或有益於勸懲」<sup>4</sup>、「大旨期不乖於風教」<sup>5</sup>、「儒者著書，當存風化，雖齊諧志怪，亦不當收悖理之言」<sup>6</sup>、「惟不失忠厚之意，稍存勸懲之旨」<sup>7</sup>，勸懲的用意十分明顯，所以魯迅才稱「則《閱微》又過偏於論議。蓋不安於僅為小說，更欲有益人心」<sup>8</sup>。

《閱微草堂筆記》記載的內容非常豐富而多樣，因此勸懲的對象也涵蓋了社會上許多方面。由於紀昀所處的時代正是漢學、宋學相爭的時代，所以書中有許多儒者言行事蹟的記載，從這些記載的刻劃中，可以看出紀昀對當時儒者讚許與厭惡為何？從愛憎之中，可以得知紀昀對漢宋學的態度為何？同時也體現了他心中的治學標準為何。在紀昀另一學術代表著作《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中，紀昀也有許多對漢宋學的看法，但或許在官修書中不能暢所欲言，或許在官修書中要顧及朝廷的學術傾向<sup>9</sup>，但在私人著述中，沒有前面的顧忌，我們如果從《閱微草

<sup>1</sup> 以嘉慶五年刊本為例，目錄所載的則數統計為 1281 則，實際點數的則數是 1172 則。

<sup>2</sup> 紀昀，〈姑妄聽之序〉，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第二冊《閱微草堂筆記》（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頁 375。

<sup>3</sup> 紀昀，〈灤陽續錄序〉，前揭書，頁 494。

<sup>4</sup> 紀昀，〈灤陽消夏錄序〉，前揭書，頁 1。

<sup>5</sup> 紀昀，〈姑妄聽之序〉，前揭書，頁 375。

<sup>6</sup> 紀昀，《灤陽消夏錄》，前揭書，卷六，頁 120。

<sup>7</sup> 紀昀，《灤陽續錄》，前揭書，卷六，頁 583。

<sup>8</sup>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 22 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138。

<sup>9</sup> 錢穆先生就認為「四庫館臣做《四庫全書提要》，對程朱宋學，均濫肆謾罵。此非敢顯背朝廷功令，實是逆探朝廷意志，而為奉迎」（《國史大綱》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頁 862。且紀昀雖然身為四庫全書館的總纂官，但對於編纂事務，卻無法事事如紀昀之意。如紀昀欲將其先高祖紀坤（1570-1642）的詩集《花王閣剩稿》收入集部卻不成：「余編《四庫全書》，嘗錄入集部。會提調有構余於王文莊（王際華 1717-1776）者，謂余濫登其家集，文莊取閱良久曰：『此衰世哀怨之音，少台閣富貴之氣象，可勿錄也。』遂改存目。同館或咎余當以理爭，不必引嫌。嗟呼！此公豈可以理爭乎？拈記見斥之始末，俾後人知之而已。」

堂筆記》對儒者形象的描述，或許可以去探索紀昀內心一些未曾言明的想法，在漢宋之爭正熾的時代氛圍中，透過這些故事的描繪，去瞭解他治學的趨向究竟為何，尤其是一向被視為反理學的紀昀，究竟與程朱理學有何立異之處。

《閱微草堂筆記》中所刻劃的儒者形象，正負面形象的刻畫都有，紀昀往往透過鬼狐之口，或譏諷、或讚揚、或揶揄。其中對講學家的形象，著墨最多，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有許多則記錄講學家的故事，紀昀透過故事的描述，把這些講學家空談高論、近名好勝、苛刻不近人情、假道學種種的醜態，刻劃得淋漓盡致。他彷彿像自己書中所記載冥司的「心鏡」一樣，能透視出這些講學家的種種心態：

圓光對照，靈府洞然：有拗捩者，有偏倚者，有黑如漆者，有曲如鉤者，有拉雜如糞牆者，有混濁如泥滓者，有城府險阻千重萬掩者，有脈絡屈盤左穿右貫者，有如荊棘者，有如刀劍者，有如蜂蠆者，有如狼虎者，有現冠蓋影者，有現金銀氣者，甚有隱隱約約現秘戲圖者，而回顧其形，則皆岸然道貌也。<sup>10</sup>

這些外貌麟鸞、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在心鏡一照之下，那包藏不測、無跡可窺的方寸靈府，就洞然若揭無所遁逃了。如同這些內心「黑如漆」、「曲如鉤」、「如糞牆」、「如泥滓」、「城府險阻千重萬掩」、「如荊棘」、「如刀劍」、「如蜂蠆」、「如狼虎」、「現冠蓋影」、「現金銀氣」、「現秘戲圖」的講學家，在紀昀筆下，也像冥司的「心鏡」一照，紛紛現形，遭致紀昀藉著鬼狐之口

（語見於臺灣中央研究院所藏《花王閣剩稿》內粘貼紀昀庚子八月因曝書檢視偶記跋語）又以《皇極經世書》一書為例，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稱「於宋儒之學，最不信河圖洛書、皇極經世書」（《槐西雜誌》卷一，前揭書，頁 251），對該書的不以為然，十分明顯。但在《四庫全書》該書書前提要中稱「其取象多不與易相同，俱難免於牽強不合，然邵子在當日用以占驗，無不奇中，故歷代皆重其書」，雖有質疑，但因為歷代皆重其書，所以還是稱該書「皆立義正大，垂訓深切，是經世一書，雖明天道而實責成於人事，洵粹然儒者之言，固非讖緯術數家所可同年而語也」，書前提要和《閱微草堂筆記》的意見竟相去甚遠。值得注意的是，書前提要又和日後經紀昀「筆削考核，一手刪定」（朱珪〈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文達紀公墓誌銘〉，錢儀吉纂，《碑傳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三十八，頁 1090）的《四庫全書總目》有所不同，後者對該書的質疑依然，「夫以邵子之占驗如神，則此書似乎可信。而此書之取象配數，又往往實不可解據」，但讚美之詞已然刪至「則粹然儒者之言，非術數家所能及，斯所以得列於周程張朱間歟？」（紀昀等，（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108，頁 1422-1423）末了還加了一句反問語氣，是已較書前提要更能表達自己的意見。能清楚看出紀昀主張的是紀昀奉敕所撰的《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其說借易以推行，而實無關於易，故朱子以為易外別傳，舊列儒家，今改隸術數類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 11，頁 417），將該書由儒家改列為子部數術類，就可以看紀昀對該書的評價了。由上述所言，可以看出紀昀最能暢所欲言當是在《閱微草堂筆記》，其次為《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再次為《四庫全書總目》，至於書前提要，依情形看來，則是要和其他兩位總纂官陸錫熊、孫士毅進行意見溝通後才能定稿，不全然是紀昀的意見了。

<sup>10</sup> 《如是我聞》，前揭書，卷一，頁 142。

痛加抨擊和諷刺<sup>11</sup>，而紀昀正是因為對這些講學家的嘴臉刻劃入微且成功，紀昀反理學的形象也就深植於此。嘉慶二十三年江藩刊行《國朝漢學師承記》，為清代漢學家樹立正統，其中卷六即為紀昀立傳，後世也因此多視之為漢學家，認為他是反對理學<sup>12</sup>。

但是細究《閱微草堂筆記》中所刻劃的儒者形象，有兩點值得注意之處，一是在《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載的真君子多是理學家，紀昀對真君子周姓老儒<sup>13</sup>、魏環極<sup>14</sup>等人形象的描繪，並不會因他們講理學就醜詆他們，也是寫出鬼狐對他們的欽敬，所以紀昀並不是全然仇視理學家，可見他對理學主敬立誠、躬行自修的功夫還是相當地敬佩，因此才有這樣對講學家正面形象的描寫。再對照《閱微草堂筆記》中紀昀對三綱五常、忠孝節義等倫理道德，仍是不餘遺力地提倡與遵守，全書中忠臣、孝子、節婦獲得鬼神欽敬、呵護的例子比比皆是<sup>15</sup>，因此從紀

<sup>11</sup>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第22章中稱：「惟紀昀本長文筆，多見秘書，又襟懷夷曠，故凡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見者，雋思妙語，時足解頤，間雜考辨，亦有灼見。敘述復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後來無人能奪其席，固非僅借位高望重以傳者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138。這種「托狐鬼以抒己見」的例子，多有所見，如下文中黃山二鬼對真德秀《大學衍義》的質疑，幾乎相同的字句也出現在《四庫全書總目》的《大學衍義》提要中。又如紀昀也曾多次論及對宋儒《易》學先天無極之說的不滿，相同的意見也在《灤陽消夏錄》卷六中藉著鬼魂崔寅之口說出來。此外，對王士禎、趙執信詩論之爭的意見，《四庫全書總目》、紀昀的〈袁清愨公詩集序〉、〈灤陽消夏錄〉卷三中木魅調停趙執信和王漁洋兩家詩說的故事，三者意見都是實無二致，是以魯迅才稱紀昀「托狐鬼以抒己見」。

<sup>12</sup> 如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北京：中華書局，1974）謂紀昀「自名漢學，深惡性理，遂峻詞醜詆，攻擊宋儒，而不肯細讀其書。」、張麗珠，紀昀反宋學的思想意義—以《四庫提要》與《閱微草堂筆記》為觀察線索，漢學研究20：1，謂紀昀以《提要》的明槍和《筆記》之暗箭來鼓動了學界的反宋學情緒。

<sup>13</sup> 「先師陳白崖先生言業師某先生，（忘其姓字，似是姓周）篤信洛閩，而不驚講學名，故窮老以終，聲華闕寂，然內行醇至，粹然古君子也。嘗稅居空屋數楹，一夜，聞窗外語曰：『有事奉白，慮君恐怖奈何！』先生曰：『第入無礙。』入則一人戴首於項，兩手扶之，首無巾而身爛衫，血漬其半。先生拱之坐，亦謙遜如禮。先生問何語？曰：『僕不幸明末戕於盜，魂滯此屋內。向有居者，雖不欲為祟，然陰氣陽光互相激博，人多驚悸，僕亦不安。今有一策，鄰家一宅，可容君眷屬，僕至彼多作變怪，彼必避去，有來居者，擾之如前，必棄為廢宅，君以賤價購之，遷居於彼，僕仍安居於此，不兩得乎？』先生曰：『吾平生不作機械事，況役鬼以病人乎？義不忍為，吾讀書此室，圖少靜耳，君既在此，即改以貯雜物，日扃鎖之可乎？』鬼愧謝曰：『徒見君案上有性理，故敢以此策進，不知君竟真道學，僕失言矣！既荷見容，即託宇下可也。』後居之四年，寂無他異，蓋正氣足以懾之矣。」（《槐西雜誌》，前揭書，卷四，頁366。）

<sup>14</sup> 「相傳魏環極先生，嘗讀書山寺，凡筆墨幾榻之類，不待拂拭，自然無塵，初不為意，後稍稍怪之。一日晚歸，門尚未啟，聞室中窸窣有聲，從隙竊覘，見一人方整飭書案，驟入掩之，其人警穿後窗去，急呼令近，其人遂拱立窗外，意甚恭謹，問：『汝何怪？』磬折對曰：『某狐之習儒者也，以公正人不敢近。然私敬公，故日日竊執僕隸役，幸公勿訝……公剛大之氣、正直之情，實可質鬼神而不愧，所以敬公者在此。』」（《姑妄聽之》，前揭書，卷二，頁410-411）

<sup>15</sup> 忠臣之例如《灤陽消夏錄》卷三「有廝養曰巴拉，從征時遇賊，每力戰，後流矢貫左頰，鏃出於右耳之後，猶奮刀砍一賊，與之俱仆。後因事至孤穆第（在烏魯木齊、特納格爾之間），夢巴拉拜謁，衣冠修整，頗不類賤役。夢中忘其已死，問向在何處？今將何往？對曰：「因

昫對講學家正反兩面的形象描寫看來，紀昫反對的是理學的末流弊端，痛恨的是虛偽的假道學罷了，對德行醇然、躬行自修的理學家，仍然是心折的，尤其在維護社會、安定人心的倫常教化上，並非是反對程朱理學的，關於這項觀點，當另文詳探。二是紀昫和理學的扞格不入，是治學方法上的差異，不管是漢、宋學的學者，總是要透過經典來學習聖賢之道，對經典的詮釋，紀昫能看出兩者的優缺點：

平心而論，《易》自王弼始變舊說，為宋學之萌芽，宋儒不攻；《孝經》詞義明顯，宋儒所爭，只今文古字句，亦無關宏旨，均姑置勿議；至《尚書》、三禮、三傳、《毛詩》、《爾雅》諸注疏，皆根據古義，斷非宋儒所能；《論語》《孟子》，宋儒積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斷非漢儒所及。蓋漢儒重師傳，淵源有自；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漢儒或執舊文，過於信傳；宋儒或憑臆斷，勇於改經。計其得失，亦復相當。<sup>16</sup>

但他也指出「唯漢儒之學，非讀書稽古，不能下一語；宋儒之學，則人人皆可以空談。其間蘭艾同生，誠有不盡饜人心者，是嗤點之所自來」<sup>17</sup>，可以看出他欣賞的是漢學重考據徵實的治學方法。但是透過考據的方法來明瞭經典的真意（通經），最終的目的還是在於落實到經國濟世的「致用」上，如果只是沉湎於復古，導致泥古而食古不化，成為迂腐的學究，甚至陷入「儒者日談考證，講曰若稽古，動至十四萬言」這種繁瑣的考證弊病當中，紀昫也會毫不客氣地給予辛辣的諷刺。正因為如此，所以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紀昫常藉著鬼狐之口痛加抨擊和諷刺那些空談高論的講學家和食古不化迂腐的學究。因此，紀昫重視通經致用的治學態度並不同於當時偏重於考據方法的漢學，只能說他是趨向漢學的

---

差遣過此，偶遇主人，一展積戀耳。」問何以得官？曰：「忠孝節義，上帝所重，凡為國捐生者，雖下至僕隸，生前苟無過惡，幽冥必與一職事；原有過惡者，亦消除前罪，向人道轉生。奴今為博克達山神部將，秩如驍騎校也」（前揭書，頁 47），**孝子之例**如《灤陽消夏錄》卷三「去余家十餘里，有瞽者姓衛，戊午除夕，偏詣常呼彈唱家辭歲，各與以食物，自負以歸。半途失足，墮枯井中。既在曠野僻徑，又家家守歲，路無行人，呼號嗑乾，無應者。幸井底氣溫，又有餅餌可食，渴甚則咀水果，竟數日不死。會屠者王以勝驅豕歸，距井有半里許，忽繩斷，豕逸狂奔野田中，亦失足墮井，持鈎出豕，乃見瞽者，已氣息僅屬矣。井不當屠者所行路，殆若或使之也。先兄晴湖問以井中情狀，瞽者曰：「是時萬念皆空，心已如死。惟念老母臥病，待瞽子以養。今並瞽子亦不得，計此時恐已餓莩，覺酸徹肝脾，不可忍耳。」先兄曰：非此一念，王以勝所驅豕必不斷繩」（前揭書，頁 55），**節婦之例**如《灤陽消夏錄》卷二記「一日，喧傳節婦至，冥王改容，皆振衣佇迓。見一老婦纍然來，其行步步漸高，如躡階級，比到，竟從殿脊上過，莫知所適。冥王憮然曰：『此已升天，不在吾鬼錄中矣。』」（前揭書，頁 35）。

<sup>16</sup> 《灤陽消夏錄》，前揭書，卷一，頁 10。

<sup>17</sup> 同前註。

治學態度，但不以漢學為藩籬。以下就對紀昀所描繪儒家的形象，分講學家空談高論的形象、食古不化迂腐學究的形象來探析，之後再依據紀昀所刻畫的儒者形象來探究他治學的趨向為何，今論述於下：

## 貳、講學家空談高論的形象

在明亡前後，中國學術思想界內部開始出現了一個要求「疾虛返實」和「實學救國」的經世致用的思潮，尤其當明亡之後，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顏習齋等大儒，生當易代，懷陸沉之痛，憾辮髮之辱，意識到「救弊之道在實學，不在空言」<sup>18</sup>，垂文作範，提倡經世致用、實事求是之學，於是顧炎武編纂的《日知錄》和《天下郡國利病書》，黃宗羲撰寫的《明夷待訪錄》，都是經世救世思潮下的著作。而在「實學」思潮的湧動中，「一時才俊之士，痛矯時文之陋，薄今愛古，棄虛崇實，挽回風氣，幡然一變」<sup>19</sup>，就在這「推崇實學，以矯空疏」<sup>20</sup>的學風中，「實體」、「實踐」、「實行」、「實習」、「實功」、「實心」、「實念」、「實言」、「實才」、「實政」、「實事」、「實風」等等「崇實黜虛」的言論大量地湧現。時至乾隆朝，「崇實黜虛」是當時朝廷的學術風尚<sup>21</sup>，也是紀昀治學的信念。紀昀和理學的扞格不入，正如門生盛時彥所說的「河間先生，以學問文章，負天下重望，而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談，標榜門戶，亦不喜才人放誕，詩壇酒社，誇名士風流」<sup>22</sup>，主要是紀昀認為理學易流於空談，以及標榜門戶所引起的門戶之爭。這種「不喜以心性空談」的性格，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有一則藉著二位不知是仙是鬼的對談，可以看出一二。故事中二鬼（二仙？）提出了對張載《西銘》和真德秀《大學衍義》的質疑，可以視為紀昀藉著鬼仙之口，對宋明理學的批判<sup>23</sup>：

<sup>18</sup> 顏元，〈性理評〉，《存學編》，《續修四庫全書》第94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三，第681-682頁。

<sup>19</sup> 皮錫瑞，《經學歷史》（台北：鳴宇出版社，1980），頁309。

<sup>20</sup> 同前註，頁306。

<sup>21</sup> 如《四庫全書總目》凡例中即明言：「聖賢之學，主於明體以達用，凡不可見諸實事者，皆屬卮言。儒生著書，務為高論，陰陽太極累牘連篇，斯已不切人事矣。至於論九河則欲修禹跡，考六典則欲復周官封建井田，動稱三代，而不揆時勢之不可行。至黃諫之流，欲使天下筆劄皆改篆體；顧炎武之流，欲使天下言語皆作古音，迂謬抑更甚焉。又如明之曲士，人喜言兵，《二麓正議》欲掘坑藏錐以刺敵，《武備新書》欲雕木為虎以臨陣，陳禹謨至欲使九邊將士人人皆讀《左傳》。凡斯之類，並闢其異說，黜彼空言，庶讀者知致遠經方，務求為有用之學。」、「今所錄者，率以考證精核，論辨明確為主，庶幾可謝彼虛談，敦茲實學」，紀昀等（北京：中華書局，1997，上冊），頁33。

<sup>22</sup> 盛時彥，〈閱微草堂筆記序〉，《紀曉嵐文集》第二冊《閱微草堂筆記》（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頁1。

<sup>23</sup> 試將《四庫全書總目》中《大學衍義》提要所言：「然自古帝王正本澄源之道，實亦不外於此。若夫宰馭百職，綜理萬端，常變經權，因機而應，利弊情偽，隨事而求，其理雖相貫通，

周化源言有二士遊黃山，留連松石，日暮忘歸。夜色蒼茫，草深苔滑，乃共坐於懸崖之下。仰視峭壁，猿鳥路窮，中間片石斜欹，如雲出岫，缺月微升，見有二人坐其上，知非仙即鬼，屏息靜聽。右一人曰：「頃遊嶽麓，聞此翁又作何語？」左一人曰：「去時方聚講《西銘》，歸時又講《大學衍義》也。」右一人曰：「《西銘》論萬物一體，理原如是。然豈徒心知此理，即道濟天下乎？父母之於子，可云愛之深矣，子有疾病，何以不能療？子有患難，何以不能救？無術焉而已。此猶非一身也。人之一身，慮無不深自愛者，己之疾病，何以不能療？己之患難，何以不能救？亦無術焉而已。今不講體國經野之政、捍災禦變之方，而曰吾仁愛之心同於天地之生物，果此心一舉，萬物即可以生乎？吾不知之矣。至《大學》條目，自格致以至治平，節節相因，而節節各有其功力。譬如土生苗，苗成禾，禾成穀，穀成米，米成飯，本節節相因。然土不耕則不生苗，苗不灌則不得禾，禾不刈則不得穀，穀不舂則不得米，米不炊則不得飯，亦節節各有其功力。西山作《大學衍義》，列目至齊家而止，謂治國平天下可舉而措之。不知虞舜之時，果瞽瞍允若，而洪水即平、三苗即格乎？抑猶有治法在乎？又不知周文之世，果太姒徽音而江漢即化、崇侯即服乎？抑別有政典存乎？今一切棄置，而歸本於齊家，毋亦如土可生苗，即炊土為飯乎？吾又不知之矣。」左一人曰：「瓊山所補，治平之道其備乎？」右一人曰：「真氏過於泥其本，邱氏又過於逐其末。不究古今之時勢，不揆南北之情形，瑣瑣屑屑，縷陳多法，且一一疏請施行，是亂天下也。即其海運一議，臚列歷年漂失之數，謂所省轉運之費，足以相抵。不知一舟人命，詎止數十；合數十舟即逾千百，又何為抵乎？亦妄談而已矣。」左一人曰：「是則然矣。諸儒所述封建井田，皆先王之大法，有太平之實驗，究何如乎？」右一人曰：「封建井田，斷不可行，駁者眾矣。然講學家持是說者，意別有在，駁者未得其要領也。夫封建井田不可行，微駁者知之，講學者本自知之。知之而必持是說，其意固欲借一必不行之事，以藏其身也。蓋言理言氣，言性言心，皆恍惚

---

而為之有節次，行之有實際，非空談心性，即可坐而致者，故邱濬又續補其闕也。」（前揭書，卷 92，上冊頁 1216-1217）和《四庫全書總目》中《大學衍義補》提要：「又力主舉行海運，平時屢以為言，此書更力申其說。所列從前海運抵京之數，謂省內河挽運之資，即可抵洋面漂亡之粟，似乎言之成理。然一舟覆沒，舟人不下百餘，糧可抵以轉輸之費，人命以何為抵乎？... 然治平之道，其理雖具於修、齊，其事則各有制置，此猶土可生禾，禾可生穀，穀可為米，米可為飯。本屬相因，然土不耕則禾不長，禾不穫則穀不登，穀不舂則米不成，米不炊則飯不熟。不能遞溯其本，謂土可為飯也。」（前揭書，卷 93，上冊頁 1225）和《閱微草堂筆記》所言兩相對照，實無二致，不僅意思相同，連所舉的例子也一樣。



無可質，誰能考未分天地之前，作何形狀；幽微曖昧之中，作何情態乎？至於實事，則有憑矣。試之而不效，則人人見其短長矣。故必持一不可行之說，使人必不能試、必不肯試、必不敢試，而後可號於眾曰：『吾所傳先王之法，吾之法可為萬世致太平，而無如人不用何也！』人莫得而究詰，則亦相率而嘆曰：『先生王佐之才，惜哉不竟其用。』云爾。以棘刺之端為母猴，而要以三月齋戒乃能觀，是即此術。第彼猶有棘刺，猶有母猴，故人得以求其削。此更托之空言，並無削之可求矣。天下之至巧，莫過於是。駁者乃以迂闊議之，烏識其用意哉！」相與太息者久之，劃然長嘯而去。二士竊記其語，頗為人述之。有講學者聞之，曰：「學求聞道而已。所謂道者，曰天曰性曰心而已。忠孝節義，猶為末務；禮樂刑政，更末之末矣。為是說者，其必永嘉之徒也夫！」<sup>24</sup>

在這篇長篇大論中，首先提出光是「心知此理」是無法「道濟天下」，還是要有「體國經野之政、捍災禦變之方」的「術」；其次論及《大學》修齊治平「節節相因」，「亦節節各有其功力」，是節節各自有其「有治法在」、「有政典存」，不能「列目至齊家而止」，就說「治國平天下可舉而措之」，邱濬補真德秀未盡之處，「又過於逐其末。不究古今之時勢，不揆南北之情形，瑣瑣屑屑，縷陳多法，且一一疏請施行，是亂天下也」，末了還對倡議封建井田者，比擬為〈棘刺刻猴〉<sup>25</sup>中的騙子，點醒在聽取講學家的言論時，應考慮道理的可行性，方能避免受到巧言詐說的迷惑。如此對講學家強烈的抨擊，主要還是在於紀昀講求的是「謝彼虛談，敦茲實學」、「務求為有用之學」，也難怪，講學者聽了會以為是出自重視事功的永嘉學派之口。紀昀並非永嘉學派之徒，但是講求的是「謝彼虛談，敦茲實學」、「務求為有用之學」，也無怪乎會痛恨空言聚訟的講學之徒<sup>26</sup>了。

<sup>24</sup> 紀昀，《姑妄聽之》，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第二冊《閱微草堂筆記》（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卷三，頁453-455。

<sup>25</sup>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台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為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為棘刺之母猴，何以理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韓非，《韓非子》（台北：古籍出版社，1996），頁673-674）

<sup>26</sup> 如在《遜齋易述》序中表達出對理學末流的痛恨：「中間持其平者，數則漢之康成，理則宋之伊川乎。康成之學不絕如線；唐史征、李鼎祚，宋王伯厚及近時惠定宇，粗傳一二而已。伊川之學傳之者多，然醇駁互見，決擇為難。余勘定四庫書，頗恨其空言聚訟也。」紀昀，《紀曉嵐文集》第一冊（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頁452。

紀昀痛恨學者徒逞口舌之辯的空談高論，主要是空談高論的弊病有二：

### 一、空談天道而捨人事，徒逞口舌之能，卻未能身體力行，無益於國計民生。

在《閱微草堂筆記·灤陽消夏錄》卷四中，紀昀寫了一則妖怪斥責時方饑荒盛行，卻在高談民胞物與的講學家的故事，他透過妖怪之口，毫不留情地給予空談高論講學家辛辣的諷刺：

武邑某公與戚友賞花佛寺經閣前，其地最豁敞，而閣上時有變怪，入夜，人即不敢坐閣下，某公以道學自任，夷然弗信也，酒酣耳熱，盛談西銘萬物一體之理，滿座拱聽，不覺入夜。忽閣上厲聲叱曰：「時方飢疫，百姓頗有死亡，汝為鄉宦，既不思早倡義舉，施粥捨藥，即應趁此良夜，閉戶安眠，尚不失為自了漢，乃虛談高論，在此講民胞物與，不知講至天明，還可作飯餐？可作藥服否？且擊汝一磚，聽汝再講邪不勝正！」忽一磚飛下，聲若霹靂，杯盤幾案俱碎。某公倉皇走出曰：「不信程朱之學，此妖之所以為妖歟！」徐步太息而去。

妖怪「在此講民胞物與，不知講至天明，還可作飯餐？可作藥服否？」一句話就點出講學家的空談，而某公「不信程朱之學，此妖之所以為妖歟！」也說出了講學者的執迷不悟。講學家空談高論是理學的流弊，但宋明理學家治學則是屢屢提及實學<sup>27</sup>，紀昀曾指出這種流弊乃是由於宋學「尚心悟……宋儒之學，則人人皆可以空談。其間蘭艾同生，誠有不盡饜人心者，是嗤點之所自來」，由於是個人內心的領悟，所以容易流於空談，再加上良莠不齊、蘭艾同生，所以成為學者批評宋學的由來，這也難怪除了用這則故事譏諷外，紀昀透過五臺僧明玉的話「然則唐以前之儒，語語有實用；宋以後之儒，事事皆空談」<sup>28</sup>，和習儒之狐的話「聖賢依乎中庸，以實心勵實行，以實學求實用。道學則務語精微，先理氣，

<sup>27</sup> 「實學」一詞的含義卻相當廣泛，其所指涉的物件也不盡相同，宋代學者心目中的「實學」與明清時學者心目中的「實學」內涵不盡相同，在二程看來，漢學末流死守章句訓詁的經學乃是一種不實無用之學，對於真正能體現聖人製作之意的經學，則冠之以「實學」之名，如「治經，實學也……為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遺書》，卷一）。清代考據學起，遂專有謂考據實證之學為「實學」者，但對於二程而言，這恰恰由於迷失在煩瑣的考證之中而不能把握聖人之道，反而是「空言無用」之學而不能稱為「實學」。另外像朱子《中庸章句》的開篇即稱《中庸》一書，「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朱子文集》、《語類》中「實學」之詞屢有出現，此不一一列舉。又如張栻說「聖門實學，貴於踐履」（《論語解》，《南軒全集》卷四）、陸象山弟子包恢作《三陸先生祠堂記》中，亦稱象山之學為「孟子之實學」（《象山全集》，卷三六）。

<sup>28</sup> 《姑妄聽之》，前揭書，卷四，頁 476。

後彝倫，尊性命，薄事功，其用意已稍別」<sup>29</sup>來表達對儒學淪為空談的不滿。紀昀既然針砭講學家的空談，他自己是能身體力行的，據紀昀的墓誌銘記載：「壬子，以畿輔水災奏請截留宦糧萬石，設十廠賑饑。得旨，六月開廠，自夏季至明年四月，全活無算」<sup>30</sup>，正是紀昀躬自力行的表現。所以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書中一再強調「以實心勵實行，以實學求實用」、「讀書以明理，明理以致用也」<sup>31</sup>，展現出「實行」和「虛談」正是紀昀對治學勸懲之所在。

紀昀也曾多次論及對宋儒《易》學先天無極之說的不滿，「故余於漢儒之學，最不信《春秋繁露》、《洪範五行傳論》；於宋儒之學，最不信《河圖洛書》、《皇極經世書》」<sup>32</sup>、「余校定秘書二十餘年，所見經解，惟《易》最多，亦惟《易》最濫……殊不知《易》之作也，本推天道以明人事，故六十四卦之大象，皆有君子以字，而三百八十四爻，亦皆吉凶悔吝為言，是為百姓日用作，非為一二上智密傳微妙也；是為明是非決疑惑作，非為讖緯禳祥預使前知也」<sup>33</sup>。「推天道以明人事」是為「明是非決疑惑」，而不是為「讖緯禳祥預使前知」；是為「百姓日用作」，而不是為「一二上智密傳微妙」。相同的意見，他在《閱微草堂筆記》中也屢屢藉著鬼狐或他人之口加以申述，如藉著道士論三教本旨言「儒之本旨，明體達用而已，文章記誦，非也；談天說性，亦非也」<sup>34</sup>、藉著鬼魂之口說出：

崔曰：「聖人作易，言人事也，非言天道也，為眾人言也，非為聖人言也。聖人從心不踰矩，本無疑惑，何待於占？惟眾人昧於事幾，每每兩歧罔決，故聖人以陰陽之消長，示人事之進退，俾知趨避而已，此儒家之本旨也。顧萬物萬事，不出陰陽，後人推而廣之，各明一義。……易道廣大，無所不包，見智見仁，理原一貫，後人忘其本始，反以旁義為正宗，是聖人作易，但為一二上智設，非千萬世垂教之書，千萬

<sup>29</sup> 《姑妄聽之》，前揭書，卷二，頁410。

<sup>30</sup> 錢儀吉纂，《碑傳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三十八，頁1090，引朱珪〈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文達紀公昀墓誌銘〉。另外《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卷五摺子中，收有紀昀十六本替各地因蠲緩積欠稅賦的謝恩摺子，也可看到紀昀為民請命的一面。

<sup>31</sup> 《姑妄聽之》，前揭書，卷四，頁488。

<sup>32</sup> 《槐西雜誌》，前揭書，卷一，頁251。紀昀在這裡並未詳述未何不信，不過在《灤陽消夏錄》卷四中引了李又聃的話，倒可以視為紀昀的意見：「宋儒據理談天，自謂窮造化陰陽之本，於日月五星；言之鑿鑿，如指諸掌。然宋曆屢變而愈差，自郭守敬以後，驗以寔測，證以交食，始知濂洛關閩，於此事全然未解，即康節最通數學，亦僅以奇偶方圓，揣摩影響，寔非從推步而知。故持論彌高，彌不免郢書燕說，夫七政運行，有形可據，尚不能臆斷以理，況乎太極先天，求諸無形之中者哉？先聖有言：『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前揭書，頁79-80。

<sup>33</sup> 紀昀，〈黎易注序〉，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第一冊（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頁155。

<sup>34</sup> 記梁谿堂言，《姑妄聽之》，前揭書，卷三，頁437。

人共喻之理矣。經者常也，言常道也，經者徑也，言人所共由也，曾是六經之首，而詭秘其說，使人不可解乎？」<sup>35</sup>

偶論太極無極之旨，其人怫然曰：「於傳有之：『天道遠，人事邇。』六經所論皆人事，即易闡陰陽，亦以天道明人事也。捨人事而言天道，已為虛杳，又推及先天之先，空言聚訟，安用此為？」<sup>36</sup>

這種抨擊「捨人事而言天道」、「而詭秘其說，使人不可解」、「空言聚訟，安用此為」的思想，和前面所引紀昀的話，兩相對照，實無二致，都是紀昀在書中每每「托狐鬼以抒己見」的例子。而紀昀的批評，最有說服力的是他能展現篤實的學問，書中談及「顧萬物萬事，不出陰陽，後人推而廣之，各明一義。楊簡王宗傳，闡發心學，此禪家之《易》，源出王弼者也；陳搏邵康節，此道家之《易》，源出魏伯陽者也；術家之《易》，衍於管郭，源於焦京」<sup>37</sup>一語就將易學原委、流派道出，而他在〈遜齋易述序〉<sup>38</sup>、〈周易義象合纂序〉<sup>39</sup>、〈黎君易注序〉<sup>40</sup>

<sup>35</sup> 記五公山人（王餘佑）與崔寅鬼魂言，《灤陽消夏錄》，前揭書，卷六，頁 112。《四庫全書總目》卷六案語也有相同的意見：「夫聖人垂訓，實教人用《易》，非教人作《易》。今不談其所以用，而但談其所以作，是《易》之一經，非千萬世遵為法戒之書，而一二人密傳妙悟之書矣。」前揭書，頁 72。

<sup>36</sup> 記文士鬼魂因和張子克學術見解不同而絕交事，《槐西雜誌》卷二，前揭書，頁 281。《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太極圖分解》提要也有相同的意見：「顧捨人事而爭天，又捨共睹共聞之天而爭耳目不及之天，其所爭者毫無與人事之得失，而曰吾以衛道。學問之醇疵、心術人品之邪正、天下國家之治亂，果繫於此二字乎？」前揭書，卷 95，頁 1240。

<sup>37</sup> 《灤陽消夏錄》，前揭書，卷六，頁 112。

<sup>38</sup> 紀昀著，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第一冊（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頁 152-153：《易》之精奧，理數詩已。《象》其闡明理數者也。自漢及宋，言數者歧而三，一為孟喜，正傳也。歧而為京、焦，流為讖緯；又歧而為陳、邵，支離曼衍，不可究詰，于《易》為附庸矣。言理者亦歧而三，乘承比應，費直《易》也。歧而為王弼、為王宗傳、為楊簡，浸淫乎佛老矣。又歧而為李光、楊萬里，比附史事，借發論端，雖不比陳、邵之徒虛糜心力，畫算經而圖奕譜，然亦《易》之外傳耳。中間持其平者，數則漢之康成，理則宋之伊川乎。康成之學不絕如線；唐史征、李鼎祚，宋王伯厚及近時惠定宇，粗傳一二而已。伊川之學傳之者多，然醇駁互見，決擇為難。

<sup>39</sup> 前揭書，頁 153-154：古今說五經者，惟《易》最夥，亦惟《易》最多歧，非惟象數。義理各明一義也。旁及爐火、導引，樂律、星曆以及六壬、禽遁、風角之屬，皆可引《易》以為解，即皆可引以解《易》。蓋《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故隨舉一說而皆通也。要其大端而論，則象教歧而三：一田、孟之《易》，一京、焦之《易》，一陳、邵之《易》也。義理亦歧而三：一王弼之《易》，一胡瑗之《易》，一李光、楊萬里之《易》也。京、焦之占候，流為怪妄而不經；陳、邵之圖書，流為支離而無用；王弼之清言，流為楊簡、王宗傳輩，至以狂禪亂聖典。其足以發揮精義、垂訓後人者，漢人之主象，宋人之主理、主事三派焉而已。顧論甘者忌辛，是丹者非素，斷斷相爭，各立門戶，垂五六百年於茲。余嘗與戴東原、周書昌言：譬一水也，農家以為宜灌溉，舟子以為宜往來，形家以為宜砂穴，兵家以為宜扼拒，遊覽者以為宜眺賞，品泉者以為宜茶荈，泔澆統者以為利浣濯：各得所求，各適其用，而水則一也。譬一都會也，可自南門入，可自北門入，可自東門入，可自西門入，各從其所近之途，各以為便，而都會則一也。《易》之理何獨不然。東坡《廬山》詩曰：「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

中對易學原委、流派、優劣更能一一詳加剖析論述，足見他的批評，並非意氣口舌之爭而已，而是有深厚的學問作為根柢，洞悉學術流變後所下的評論。紀昀更以「宋曆屢變而愈差」，來抨擊宋儒太極先天求諸無形的誤謬：

宋儒據理談天，自謂窮造化陰陽之本，於日月五星；言之鑿鑿，如指諸掌。然宋曆屢變而愈差，自郭守敬以後，驗以寔測，證以交食，始知濂洛關閩，於此事全然未解，即康節最通數學，亦僅以奇偶方圓，揣摩影響，寔非從推步而知。故持論彌高，彌不免郢書燕說，夫七政運行，有形可據，尚不能臆斷以理，況乎太極先天，求諸無形之中者哉？<sup>41</sup>

以「七政運行，有形可據，尚不能臆斷以理，況乎太極先天求諸無形之中者哉？」，真可謂對空談臆說一針見血的評論。

## 二、空談高論造成臆斷的弊病。

宋明理學據理談天說性，講求格物窮理，但是紀昀認為「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然六合之中，實亦有不能論者」<sup>42</sup>、「理所必無者，事或竟有，然究亦理之所有也，執理者自泥古耳」<sup>43</sup>、「然則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多

---

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通此意以解《易》，則《易》無門戶矣。紛紛互詰，非仁智自生妄見乎。

<sup>40</sup> 前揭書，頁 155：夫天地絪縕，是涵元氣，氣有屈伸往來，於是乎生數；數有奇偶錯綜，於是乎成象，此象數所由起也。然屈伸往來，奇偶錯綜，皆理之所寓，而所以屈伸往來，所以奇偶錯綜者，亦皆理之不得不行。故理其自然，數其必然，象其當然，一以貫之者也。漢《易》言數象，不能離存亡進退，非理而何；宋《易》言理，不能離乘承比應，非象數而何。而顧曰：言理則棄象數，言象數即棄理，豈通論哉！余校定秘書二十餘年，所見經解，惟《易》最多，亦惟《易》最濫，大抵漢《易》一派，其善者必由象數以求理；或捨理者，必流為雜學。宋《易》一派，其善者必由理以知象數，或捨象數者，必流為異學。其弊一由爭門戶，一由驚新奇，一由一知半解，沾沾自喜，而不知《易》道之廣大，紛紜膠轕，遂曼衍而日增，殊不知《易》之作也，本推天道以明人事，故六十四卦之大象，皆有君子以字，而三百八十四爻，亦皆吉凶悔吝為言，是為百姓日用作，非為一二上智密傳微妙也；是為明是非決疑惑作，非為讖緯機祥預使前知也。故其書至繁至賾，至精至深，而一一皆切於事。既切於事，即一一皆可推以理。理之自然者明，則數之必然、象之當然，割然解矣。又何必曰此彼法、此我法、此古義、此新義哉！

<sup>41</sup> 《濼陽消夏錄》，前揭書，卷四，頁 79-80。《四庫全書總目》，子部《讀書偶記》提要也有相同的意見：「惟太極一圖，經先儒闡發，已無剩義，而繪圖作說，累牘不休，殊為支蔓。夫人事邇，天道遠，日月五星，有形可見。儒者所論，自謂精微，推步家實測驗之，其不合者固多矣，況臆度諸天地之先乎？」（前揭書，卷 94，頁 1237。）

<sup>42</sup> 《濼陽消夏錄》卷四，前揭書，頁 79。

<sup>43</sup> 《如是我聞》，前揭書，卷一，頁 156。

矣，可據理臆斷歟？」<sup>44</sup>、「天下真有理外事也」<sup>45</sup>，正因為天地之大無所不有，幽明之理凡人難知，世上有許多無法以常理推論的事，不必曲為之詞，也不必力攻其非，「闕所疑可矣」<sup>46</sup>。但是講學家「執其私見，動曰此理之所無」<sup>47</sup>、「天地之大，無所不有，宋儒每於理所無者，即斷其必無，不知無所不有，即理也」<sup>48</sup>、「宋儒於理不可解者，皆臆斷以為無是事」<sup>49</sup>，因此紀昀以其親身經歷之事、鄉里奇事、或忠厚之人所言，來抨擊講學家「以理斷天下事，不盡其變」<sup>50</sup>，講學家的臆斷「不亦顛乎？」<sup>51</sup>、「毋乃膠柱鼓瑟乎？」<sup>52</sup>。

紀昀以其親身經歷來辯駁講學家臆斷的事有二，一是親見回煞之事：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然六合之中，實亦有不能論者。人之死也，如儒者之論，則魂升魄降已耳，即如佛氏之論鬼，亦收錄於冥司，不能再至人世也，而世有回煞之說；庸俗術士，又有一書能先知其日辰時刻，與所去之方向，此亦誕妄之至矣。然余嘗於隔院窗樓中，遙見其去，如白煙一道，出於竈突之中，冉冉向西南而歿，與所推時刻方向，無一差也。又嘗兩次手自啟鑰，諦視布灰之處，手跡足跡，宛然與生時無二，所親皆能辨識之，是何說歟？禍福有命，死生有數，雖聖賢不能與造物爭，而世有蠱毒魘魅之術，明載於刑律，蠱毒余未見，魘魅則數見之，為是術者，不過瞽者巫者與土木之工。然寔能禍福死生人，歷歷有驗，是天地鬼神之權，任其播弄無忌也，又何說歟？其中必有理焉，但人不能知耳！宋儒於理不可解者，皆臆斷以為無是事，毋乃膠柱鼓瑟乎？<sup>53</sup>

一是紀昀修《熱河志》時，親自命人探一奇境之事：

44 《姑妄聽之》，前揭書，卷二，頁 411。

45 《灤陽續錄》，前揭書，卷三，頁 531。

46 《灤陽消夏錄》，前揭書，卷四，頁 67。

47 《灤陽續錄》，前揭書，卷一，頁 502。

48 《灤陽消夏錄》，前揭書，卷六，頁 115。

49 《灤陽消夏錄》，前揭書，卷四，頁 79。

50 《槐西雜誌》，前揭書，卷二，頁 276。

51 《灤陽續錄》，前揭書，卷一，頁 502。

52 《灤陽消夏錄》，前揭書，卷四，頁 79。

53 《灤陽消夏錄》，前揭書，卷四，頁 79。又在《灤陽消夏錄》中「然回煞形跡，余實屢目睹之，鬼神茫昧，究不知其如何也」，前揭書，卷五，頁 98、《槐西雜誌》中「余乞假養病北倉……忽見綵衣女子揭簾入，甫露面，即退出。疑為趁座妓女，呼僕隸遣去，皆云外戶已閉，無一人也。主人曰：『四日前有宦家子婦宿此卒，昨移柩去，豈其回煞耶？』」，前揭書，卷四，頁 358。都是記錄紀昀親見回煞的經驗。

長城以外，萬山環抱，然皆坡陀如岡阜，至王家營迤東，則嶽崎秀拔，皴皴皆含畫意，蓋天開地獻，靈氣之所鍾故也。有羅漢峰，宛似一僧趺坐，頭頂胸腹臂肘，歷歷可數。有磬鍾峰，即《水經注》所稱武列水側，有孤石雲舉者也，上豐下銳，屹若削成。余修《熱河志》時，曾躡梯挽綆至其下，乃無數石卵，與碎砂凝結而成，亙古不圯，莫明其故。有雙塔峰，亭亭對立，遠望望如兩浮圖，挾地湧出，無路可上。或夜聞上鐘磬經唄聲，晝亦時有，片雲往來。乾隆庚戌，予特命守吏，構木為梯，遣人登視。一峰周圍一百六步，上有小屋，屋中一幾一香鑪，中供片石，鐫王仙生三字；一峰周圍六十二步，上種韭二畦，塋畛方正，如園圃之所築，是決非人力所到，不謂之仙蹤靈跡不得矣。耳目之前，倘恍莫測尚如此，講學家執其私見，動曰此理之所無，不亦顛乎？<sup>54</sup>

紀昀又以家鄉獻縣所發生的兩件異事，太僕戈芥舟將之載入縣志，講學家頗病其語怪。但紀昀認為是「夫受給亦愚矣，然惟愚故誠，惟誠故鬼神為之恪，此無理而有至理也」、「以命自安，不受人報，故神代報也，非乃無理而亦有至理乎」，這兩件奇事表面上看來是荒誕無理，卻含有至誠感天、為善受報的至理：

理所必無者，事或竟有，然究亦理之所有也，執理者自泥古耳。獻縣近歲有二事：一為韓守立妻俞氏，事祖姑至孝，乾隆庚辰，祖姑失明，百計醫禱，皆無驗。有點者給以封肉燃燈，祈神佑，則可速愈，婦不知其給也，竟封肉燃之。越十餘日，祖姑目竟復明，夫受給亦愚矣，然惟愚故誠，惟誠故鬼神為之恪，此無理而有至理也。一為丐者王希聖，足雙攣，以股代足，以肘撐之行，一日，於路得遺金二百，移橐匿草間，坐守以待覓者，俄商家主人張際飛，倉皇尋至，叩之，語相符，舉以還之，際飛請分取不受，延至家，議養贍終其身。希聖曰：「吾形殘廢，天所罰也，違天坐食，將必有大咎。」毅然竟去。後困臥斐聖公祠下，（斐聖公不知何時人，志乘亦不能詳，土人云祈雨時有驗。）忽有醉人曳其足，痛不可忍，醉人去後，足已伸矣，由於遂能行，至乾隆己卯乃卒。際飛故先祖門客，余猶及見，自述此事甚詳。蓋希聖為善宜受報，而以命自安，不受人報，故神代報也，非乃無理而亦有至理乎？戈芥舟前輩，嘗載此二事於縣志，講學家頗病其語怪，余謂芥舟此志，惟乩仙聯句及王生殤子二條偶不割愛耳，全書皆

<sup>54</sup> 《灤陽續錄》，前揭書，卷一，頁 502。

體例謹嚴，具有史法，其載此二事，正以見匹夫匹婦足感神明，用以激發善心，砥礪薄俗，非以小說家言，濫登與記也。<sup>55</sup>

紀昀又以其流放烏魯木齊時所聞異事，來說明世上就有不親眼目睹，難以相信的怪事：

烏魯木齊多狎邪，小樓深巷，方響時聞，自譙鼓初鳴，至寺鐘欲動，燈火恆熒熒也，冶蕩者惟所欲為，官弗禁，亦弗能禁。有寧夏布商何某，年少美風姿，貲累千金，亦不甚吝，而不喜為北里遊，惟蓄牝豕十餘，飼極肥，濯極潔，日閉戶而逡淫之，豕亦相摩相倚，如昵其雄。僕隸恆竊窺之，何弗覺也，忽其友乘醉戲詰，乃愧而投井死。迪化廳同知木金泰曰：「非我親鞠是獄，雖司馬溫公以告我，我勿信也。」余作是地雜詩曰：「石破天驚事有無，從來好色勝登徒。何郎甘為風情死，纔信劉郎愛媚豬」即詠是事。人之性癖有至於是者，乃知以理斷天下事，不盡其變，即以情斷天下事，亦不盡其變也。<sup>56</sup>

此外，紀昀還將他認為可信的聽聞紀錄下來。如紀錄大學士伍彌泰在西藏所見的異事：

大學士伍公彌泰言：「向在西藏，見懸崖無路處，石上有天生梵字大悲咒，字字分明，非人力所能，亦非人跡所到。」當時曾舉其山名，梵音難記，今忘之矣。公一生無妄語，知確非虛構，天地之大，無所不有，宋儒每於理所無者，即斷其必無，不知無所不有，即理也。<sup>57</sup>

紀昀又紀錄當值時，聽宋蒙泉講述的輪迴異聞：

宋蒙泉言：「孫峨山先生嘗臥病高郵舟中，忽似散步到岸上，意殊爽適，俄有人導之行，恍惚忘所以，亦不問，隨去至一家，門徑甚華潔。漸入內室，見少婦方坐蓐，欲退避，其人背後拊一掌，已昏然無知。久而漸醒，則形已縮小，繡置錦緞中，知為轉生，已無可奈何。欲有言則覺寒氣自窗門入，輒噤不能出，環視室中幾榻器玩，及對聯書畫皆了了。至三日，婢抱之浴，失手墜地，復昏然無知，醒則仍臥舟中。家中云氣絕已三日，以四肢柔軟，心膈尚溫，不敢殮耳。先生急取片

<sup>55</sup> 《如是我聞》，前揭書，卷一，頁 156-157。

<sup>56</sup> 《槐西雜誌》，前揭書，卷二，頁 276。

<sup>57</sup> 《灤陽消夏錄》，前揭書，卷六，頁 115。



紙，疏所見聞，遣使由某路送至某門中，告以勿過撻婢，乃徐為家人備言。是日疾即癒，逕往是家，見婢媪皆如舊識，主人老無子，相對惋歎，稱異而已。」近夢通政鑑溪，亦有是事，亦記其道路門戶，訪之，果是日生兒即死，頃在直廬圖閣學時，泉（宋蒙泉）言其狀甚悉，大抵與峨山先生所言相類，惟峨山先生記往不記返，鑑溪則往返俱分明，且途中遇其先亡夫人到家，入室時，見夫人與女共坐，為小異耳。案輪迴之說，儒者所闢，而實則往往有之。前因後果，理自不誣，惟二公暫入輪迴，旋歸本體，無故現此泡影，則不可以理推。六合之外，聖人持而不論，闕所疑可矣。<sup>58</sup>

除了舉這些事例來說明天地之大無所不有，以凸顯講學家以理臆斷的荒謬外，紀昀最不滿意宋儒用這種臆斷的態度來治經<sup>59</sup>，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更是屢申其義，辯駁以臆斷講經之非：

相去數千里，以燕趙之人談滇黔之俗，而謂居是土者，不如吾所知之確，然耶？否耶？晚出數十年，以髻鬣之子，論耆舊之事，而曰見其人者，不如我所知之確，然耶？否耶？左丘明身為魯史，親見聖人，其於《春秋》，確有源委。至唐中葉，陸淳輩始持異論，宋孫復以後，闕然佐鬥，諸說爭鳴，皆曰左氏不可信，吾說可信，何以異於是耶？蓋漢儒之學務實，宋儒則近名，不出新義，則不能聳聽；不排舊說，則不能出新義，諸經訓詁，皆可以口辯相爭，惟《春秋》事跡釐然，難於變亂。於是謂左氏為楚人、為七國初人、為秦人，而身為魯史、親見聖人之說搖。既非身為魯史、親見聖人，則傳中事跡，皆不足據，而後可惟所欲言矣。沿及宋季，趙鵬飛作《春秋經筌》，至不知成風為僖公生母，尚可與論名分、定貶褒乎？元程端學推波助瀾，尤為悍厲。<sup>60</sup>

<sup>58</sup> 《灤陽消夏錄》，前揭書，卷四，頁 66-67。

<sup>59</sup> 紀昀治學有反對「據後駁前」的傾向，不僅以此反對宋儒用這種臆斷的態度來治經，也曾以此對顧炎武之說，提出質疑：「楊令公祠在古北口，內祀宋將楊業，顧亭林《昌平山水記》據《宋史》謂業戰死長城北口，當在雲中，非古北口也。考王曾《行程錄》已云古北口內有業祠，蓋遼人重業之忠也，為之立廟。遼人親與業戰，曾奉使時，距業僅數十年，豈均不知業歿於何地？《宋史》則元季托克托所修，（托克托舊作脫脫，蓋譯音未審，今從《三史國語解》）距業遠矣，似未可據後駁前也。」，《槐西雜誌》，前揭書，卷二，頁 280。

<sup>60</sup> 《槐西雜誌》，前揭書，卷二，頁 279-280。在《四庫全書總目》凡例也有此言：「論史主於示褒貶，然不得其事跡之本末，則褒貶何據而定僖。如成風為魯僖公之母，明載《左傳》，而趙鵬飛《春秋經筌》謂不知為莊公之妾，為僖公之妾。是不知其人之名分，可定其禮之得失乎？」，前揭書，上冊頁 32-33。

《易》之象數，《詩》之小序，《春秋》之三傳，或親見聖人，或去古未遠，經師授受，端緒分明，宋儒曰：「漢前人皆不知，吾以理知之也。」其類此夫！<sup>61</sup>

「漢前人皆不知，吾以理知之也」，一語就顯露出臆斷的心態，紀昀還以其流放西域時，一樁真偽顛倒的事，來說明耳目所見尚且真偽難分，以理臆斷又豈能無誤？

後漢敦煌太守裴岑〈破呼衍王碑〉在巴生坤海子上關帝祠中，屯軍耕墾，得之土中也。其事不見《後漢書》，然文句古奧字畫渾樸，斷非後人所依託，以僻在西域，無人摹搨，石刻鋒稜猶完整。乾隆庚寅，遊擊劉存存，（此是其字，其名偶忘之矣，武進人也。）摹刻一木本，灑火藥於上，燒為斑駁，絕似古碑，二本並傳於世，賞鑒家率以舊石本為新，新木本為舊，與之辯，傲然弗信也。以同時之物，有目睹之人，而真偽顛倒尚如此，況以千百年外哉？<sup>62</sup>

而對程端學沿襲宋儒疑經改經臆斷之非，紀昀除了在《四庫全書總目》嚴詞辯駁<sup>63</sup>外，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更藉已成爲神明的紀叔姬之口，親自辯白程端學臆斷的誤謬：

偶在五雲多處，（即原心亭）檢校端學《春秋解》<sup>64</sup>，周編修書昌因言：「有士人得此書，珍為鴻寶，一日與友人遊泰山，偶談經義，極稱其論叔姬歸鄆一事，推闡至精。夜夢一古妝女子，儀衛尊嚴，厲色詰之曰：『武王元女，實主東獄。上帝以我艱難完節，接跡共薑，俾隸太姬為貴神，今二千餘年矣。昨爾述豎儒之說，謂我歸鄆為淫於紀季，虛辭誣詆，實所痛心。我隱公七年歸紀，莊公二十年歸鄆，相距三十四年，已在五旬以外矣。以斑白之嫠婦，何由知季必悅我？越國相從，《春秋》之法，非諸侯夫人不書，亦如非卿不書也。我待年之

<sup>61</sup> 《如是我聞》，前揭書，卷四，頁 233。

<sup>62</sup> 《如是我聞》，前揭書，卷四，頁 233。

<sup>63</sup> 如「至程端學春秋本義竟指高為漢初人，則講學家臆斷之詞，更不足與辨矣！」（《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公羊傳注疏》提要，前揭書，上冊卷 26，頁 330）、「如經書紀履緌來逆女伯姬歸于紀，此自直書其事，舊無褒貶。端學必謂履緌非命卿，紀不當使來迎；魯亦不當聽其迎。夫履緌為命卿，固無明文，其非命卿，又有何據乎？紀叔姬之歸鄆，舊皆美其不以盛衰易志，歸於夫族。端學必以為當歸魯而不當歸鄆，斯已刻矣，乃復誣以失節於紀季，此又何所據乎？」（《四庫全書總目》《春秋本義》提要，前揭書，上冊卷 28，頁 356）

<sup>64</sup> 程端學未見著錄《春秋解》，疑是指《春秋本義》，紀昀偶誤舉。

勝，例不登諸簡策，徒以矢心不二，故仲尼有是特筆。程端學何所憑據而造此曖昧之謗耶？爾再妄傳，當齷爾舌。」命從神以骨朵擊之，狂叫而醒，遂燬其書。」余戲謂書昌曰：「君耽宋學，乃作此言。」書昌曰：「我取其所長，而不敢諱所短也。」是真持平之論矣。<sup>65</sup>

因為在魯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後，紀侯的二夫人紀叔姬還會到鄆地投靠小叔紀季，程端學認為當歸於母族魯國而不應歸於夫族鄆地，據此而認定紀叔姬失節於紀季。紀昀在這則故事中，藉已成為神明的紀叔姬之口，親自辯白程端學臆斷的誤謬「我隱公七年歸紀，莊公二十年歸鄆，相距三十四年，已在五旬以外矣。以斑白之嫠婦，何由知季必悅我？越國相從，《春秋》之法，非諸侯夫人不書，亦如非卿不書也。我待年之勝，例不登諸簡策，徒以矢心不二，故仲尼有是特筆」，說出《四庫全書總目》沒說出的辯白。紀昀厲害的是，藉著耽於宋學的周書昌（永年）來講述這件事，更突顯出程端學臆斷的荒謬。對於講學家臆斷的荒謬，紀昀當然不會放棄揶揄的機會：

姚安公言昔在舅氏陳公德音家，遇驟雨，自巳至午息，所雨皆漚麻水也。時西席一老儒方講學，眾因叩曰：「此雨究竟是何理？」老儒掉頭面壁曰：「子不語怪。」<sup>66</sup>

面對眾人的詢問，這位講學家無法用他談天說性、講求格物窮理的本事來回答，也沒辦法胡言亂語妄加臆斷，只能掉頭面壁，以「子不語怪」來搪塞，無詞以對的窘態，在此表露無遺。

### 參、食古不化、迂腐學究的形象

《閱微草堂筆記》中紀昀另一個譏諷揶揄的對象就是那些讀書不通、不明世事，迂腐的老學究。紀昀稟承庭訓<sup>67</sup>，講求的是「以實心勵實行，以實學求實用」

<sup>65</sup> 《槐西雜誌》，前揭書，卷二，頁280。

<sup>66</sup> 《如是我聞》，前揭書，卷四，頁221。

<sup>67</sup> 《灤陽續錄》卷三記先姚安公言：「子弟讀書之餘，亦當使略知家事，略知世事，而後可以治家，可以涉世。明之季年，道學彌尊，科甲彌重，於是黠者坐講心學，以攀援聲氣，樸者株守課冊以求取功名，致讀書之人，十無二三能解事。崇禎壬午，厚齋公攜家居河間，避孟村土寇，厚齋公卒後聞大兵將至河間，又擬鄉居，瀕行時，比鄰一叟，顧門神嘆曰：『使今日有一人如尉遲敬德、秦瓊當不至此。』汝兩曾伯祖，一諱景星，一諱景辰，皆名諸生也。方在門外束襜被，聞之，與辯曰：『此神荼鬱壘像，非尉遲敬德、秦瓊也。』叟不服，檢邱處機《西遊記》為證。二公謂委巷小說不足據，又入室取東方朔《神異經》與爭。時已薄暮，檢尋既移時，反覆講論又移時，城門已闔，遂不能出。次日將行，而大兵已合圍矣。城破，遂全家遇難，惟汝曾祖光祿公，曾伯祖鎮香公，及叔祖雲臺公存耳。死生呼吸，間不容髮之

68、「讀書以明理，明理以致用也」<sup>69</sup>，如在編次《四庫全書》子部諸家時，特意將「舊史多退之於末簡」的農家、醫家這兩類，緊列於「禮樂兵刑，國之大柄」的儒、兵、法三家之後，看重的就是有濟眾之實用<sup>70</sup>。因此對於不明世事、食古不化的老學究，是頗為譏諷<sup>71</sup>和痛心。他譏諷和痛心的對象，有的是墨守制藝的老學究，如《灤陽消夏錄》卷一中的老學究讀書一生，胸中所讀之書在睡夢中「字字化為黑煙，籠罩屋上，諸生誦讀之聲，如在濃雲密霧中。實未見光芒」，透過鬼魂之口，深深地表達出紀昀對理學淪為講章時文的不滿，因此加以揶揄，而老學究讀書不通的形象也就躍然紙上了：

愛堂先生言：聞有老學究夜行，忽遇其亡友，學究素剛直，亦不怖畏，問君何往，曰：「吾為冥吏，至南村有所勾攝，適同路耳。」因並行。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廬也。」問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晝營營，性靈汨沒，惟睡時一念不生，元神朗澈，胸中所讀之書，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竅而出。其狀縹緲繽紛，爛如錦繡，學如鄭孔，文如屈宋班馬者，上燭霄漢，與星月爭輝，次者數丈，次者數尺，以漸而差。極下者，亦熒熒如一燈，照映戶牖，人不能見，惟鬼神見之耳。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而知。」學究問：「我讀書一生，睡中光芒當幾許？」鬼囁嚅良久曰：「昨過君塾，君方晝寢。見君胸中高頭講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經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為黑煙，籠罩屋上，諸生誦讀之聲，如在濃雲密霧中。實未見光芒，不敢妄語。」學究怒叱之，鬼大笑而去。<sup>72</sup>

---

時，尚考證古書之真偽，豈非惟知讀書，不預外事之故哉？」，前揭書，頁 532。紀昀不諱言其族祖在大兵圍城之際，尚考證古書真偽，不及逃生而遇害，意在警惕讀書不通、不明世事，迂腐的學究。或許因為紀家曾發生這樣的慘事，所以才會特別重視實學。

68 《姑妄聽之》，前揭書，卷二，頁 410。

69 《姑妄聽之》，前揭書，卷四，頁 488。

70 紀昀，〈濟眾新編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179-180。紀昀也提及會為此書作序是「偶見其書，喜其有濟眾之實心，而又有濟眾之實用」。

71 如在《姑妄聽之》中譏諷講學家不如老河兵之事：滄州南，一寺臨河干，山門圯於河，二石獸並沈焉。閱十餘歲，僧募金重修，求二石獸於水中，竟不可得，以為順流下矣。棹數小舟，曳鐵鉸尋十餘里無跡，一講學家設帳寺中，聞之笑曰：「爾輩不能究物理，是非木柿，豈能為暴攜之去？乃石性堅重，沙性鬆浮，湮於沙上，漸沉漸深耳。沿河求之，不亦顛乎？」眾服為確論。一老河兵，聞之又笑曰：「凡河中失石，當求之於上流。蓋石性堅重，沙性鬆浮，水不能衝石，其反激之力，必於石下迎水處齧沙為坎穴。漸沉漸深，至石之半，石必倒擲坎穴中。如是再齧，石又再轉，轉轉不已，遂反溯流逆上矣。求之下流固顛？求之地中，不更顛乎？」如其言，果得於數里外。然則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多矣，可據理臆斷歟？（前揭書，卷二，頁 411。）

72 《灤陽消夏錄》，前揭書，卷一，頁 2。

有的是譏諷泥古、復古的學究，痛恨他們食古不化、昏憤害事：

奴子溥顯喜讀書，頗知文義，亦稍知醫藥，性情迂緩，望之如偃蹇老儒。一日步行市上，逢人輒問見魏三兄否(奴子魏藻，行三也)？或指所在，復雅步以往。比相見，喘息良久，問相見何意？曰適在苦水井前，遇見三嫂在樹下作鐵甯，倦而假寐，小兒嬉戲井旁，相距三五尺耳。似乎可慮，男女有別，不便呼三嫂使醒，故走覓兄，魏大駭奔往，則婦已俯井哭子矣。夫僮僕讀書，可云佳事，然讀書以明理，明理以致用也，食而不化，至昏憤僻謬，貽害無窮，亦何貴此儒者哉？<sup>73</sup>

溥顯雖然是奴僕，但紀昀已經把他視為老儒，所以才說出「何貴此儒者哉？」的話，他既痛心溥顯食古不化的弊病，執著於男女有別的信念，而讓悲劇發生，才令紀昀發出「昏憤僻謬，貽害無窮」的浩歎，但也生動地描繪出一個不知變通、死守教條迂腐老學究的形象。另如《灤陽消夏錄》卷三中，紀昀高祖厚齋公（紀坤 1570-1642）之友的復古、泥古的形象，也是在紀昀的筆下被生動逼真地描繪出來：

劉羽沖，佚其名，滄州人。先高祖厚齋公多與唱和，性孤僻，好講古制，實迂闊不可行。嘗倩董天士作畫，倩厚齋公題。內《秋林讀書》一幅云：「兀坐秋樹根，塊然無與伍。不知讀何書？但見鬚眉古。只愁手所持，或是井田譜。」蓋規之也。偶得古兵書，伏讀經年，自謂可將十萬。會有土寇，自練鄉兵與之角，全隊潰覆，幾為所擒。又得古水利書，伏讀經年，自謂可使千里成沃壤。繪圖列說於州官。州官亦好事，使試於一村。溝洫甫成，水大至，順渠灌入，人幾為魚。由是抑鬱不自得，恒獨步庭階，搖首自語曰：「古人豈欺我哉？」如是日千百遍，惟此六字。不久，發病死。後風清月白之夕，每見其魂在墓前松柏下，搖首獨步。傾耳聽之，所誦仍此六字也。或笑之，則歛隱。次日伺之，復然。泥古者愚，何愚乃至是歟？何文勤公嘗教昀曰：「滿腹皆書能害事，腹中竟無一卷書，亦能害事。國弈不廢舊譜，而不執舊譜；國醫不泥古方，而不離古方。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曰：『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sup>74</sup>

<sup>73</sup> 《姑妄聽之》，前揭書，卷四，頁 487-488。

<sup>74</sup> 《灤陽消夏錄》，前揭書，卷三，頁 50。

劉羽沖一生因為泥古而欲復古，但食古不化致使練兵不成、治水也失敗，但還是執著於「古人豈欺我哉」，至死不悟，也難怪引起紀昀發出「何愚乃至是歟？」的浩嘆。紀昀治學崇實黜虛的態度，重視的是實學、實行、實心、實用、明理致用，當然會反對泥古、復古，除了上兩則的引述外，《姑妄聽之》卷三所提到的黃山二鬼<sup>75</sup>，也是譏諷講學家主張恢復井田制度的不可行。紀昀除了反對食古不化的泥古、復古外，他對漢學流於繁瑣考據的弊端也有所不滿，清乾隆、嘉慶年間，是漢學極盛，宋學起而抗之的時期。紀昀雖身處於「漢學家的大本營」<sup>76</sup>的四庫館中，從往交遊也多是漢學家朋友王鳴盛、錢大昕、朱筠、盧文弨、王昶、戴震之輩<sup>77</sup>。但他並不願偏廢一方，對待漢學和宋學，他持著一種理性的態度<sup>78</sup>，和一般人的觀念，認為紀昀是仇視宋學的漢學家有些出入，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紀昀對漢學之弊，一如對宋學之弊，同樣都給予辛辣的譏諷：

朱青雲言，嘗與高西園散步水次。時春冰初泮，淨綠瀛溶。高曰：「憶晚唐有『魚鱗可憐紫，鴨毛自然碧』句，無一字言春水而晴波滑笏之狀，如在目前。惜不記其姓名矣。」朱沉思未對，聞老柳後有人語曰：「此初唐劉希夷詩，非晚唐也。」趨視無一人，朱悚然曰：「白日見鬼矣！」高微笑曰：「如此鬼，見亦大佳，但恐不肯相見耳。」對樹三揖而行。歸檢劉詩，果有此二語。余偶以告戴東原，東原因言有兩生燭下對談，爭春秋周正夏正，往復甚苦，窗外忽太息言曰：「左氏周人，不容不知周正朔，二先生何必費詞也？」出視窗外，惟一小僮方酣睡。觀此二事，儒者日談考證，講曰若稽古，動至十四萬言，安知冥冥之中，無在旁揶揄者乎？<sup>79</sup>

在乾嘉考據學風如日中天的時代，對大家趨之若鶩的考據之學，紀昀竟敢透過鬼神之口而加以揶揄，如果紀昀果真一味反對宋學，又怎麼會有譏諷漢學「儒者日談考證，講曰若稽古，動至十四萬言，安知冥冥之中，無在旁揶揄者乎？」的記述呢？另有一則書生借視狐精之書「皆五經、論語、孝經、孟子之類。但有

<sup>75</sup> 「周化源言：有二士遊黃山」條，前揭書，頁 453-455。

<sup>76</sup>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水牛出版社，1981）。

<sup>77</sup> 紀昀和王鳴盛、錢大昕、朱筠、王昶都是乾隆十九年同科進士，且紀昀居於北京虎坊橋給孤寺旁，與王鳴盛寓齋僅隔一垣，兩人往還甚歡，以詩相酬，傳看紀昀所編的《張為主客圖》（王鳴盛有〈虎坊新居與紀昀起士昀隔一垣旁有給孤寺〉一詩）；又結識戴震成為莫逆之交。戴震凡赴京師，總要居於紀昀家與他切磋商討學問，互訴別情「東原與昀交二十餘年，主昀家前後幾十年」（紀昀著，〈與余存吾太史書〉，《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274）。

<sup>78</sup> 侯健，〈閱微草堂筆記的理性主義〉，《中外文學》，8 卷 1 期（1980 年 6 月），頁 30-48。侯健認為「紀昀的主題，恰也是一個理字，但是一個深具彈性的理，而無絕對與武斷的氣息」、「紀昀仍要調停兩者，不肯偏廢」、「他調停兩者，不趨極端的態度」，詳見該文。

<sup>79</sup> 《灤陽消夏錄》，前揭書，卷五，頁 96。

經文而無注。問經不解釋，何由講貫？老翁曰：『吾輩讀書，但求明理。聖賢言語本不艱深，口相授受，疏通訓詁，即可知其義旨，何以注為？』<sup>80</sup>，也頗有借狐精之口，表達出對儒者陷入訓詁泥淖的譏諷。再對照《閱微草堂筆記》中紀昀對周姓老儒、魏環極等人形象的描繪，並不會因他們講理學就醜詆他們，也是寫出鬼狐對他們的欽敬。所以紀昀對理學主敬立誠、躬行自修的功夫還是相當地敬佩，因此才有這樣對講學家正面形象的描寫，而紀昀在治學和立身處世的態度，倒頗有「治經宗漢儒，立身宗宋儒」、「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sup>81</sup>的意味。再看紀昀〈丙辰會試錄序〉一文中，他很清楚地表達出對漢宋學不偏廢的態度：

良以制藝主於明義理，固當以宋學為宗，而以漢學補苴其所遺。糾繩其太過耳，如竟以訂正字畫，研尋音義，務旁徵遠引以眩博，而義理不求其盡合，毋乃於聖朝造士之法稍未深思乎。夫古學，美名也；崇獎古學，亦美名也。名所集而利隨焉，故弋獲者有之；利所集而偽生焉，故割剝讖緯，掇拾蒼雅，編為分類之書，以備剿說之用者亦有之。

82

在序中紀昀提出了「明義理，固當以宋學為宗，而以漢學補苴其所遺」，但也指出了漢學的流弊「以訂正字畫，研尋音義，務旁徵遠引以眩博，而義理不求其盡合……夫古學，美名也；崇獎古學，亦美名也。名所集而利隨焉，故弋獲者有之；利所集而偽生焉，故割剝讖緯，掇拾蒼雅，編為分類之書，以備剿說之用者亦有之」，可見他並不完全排斥宋學、偏頗漢學，也能指出崇獎古學（漢學）所衍生的流弊。

#### 肆、紀昀的治學趨向

由上述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對儒者形象種種的刻畫，可以看出紀昀「崇實黜虛」的理念，使他在治學方法上趨向於漢學而反對空談，這是紀昀和程朱理學治學方法上的立異處，所以才有種種的譏諷和抨擊，也因此造成認為他是反理學的印象。雖然在「通經」的方法上他認同漢學，但在「致用」的目標上，他並

<sup>80</sup> 《灤陽消夏錄》，前揭書，卷三，頁 53。

<sup>81</sup> 江藩，《經解入門》〈漢宋門戶異同〉節，（天津市古籍書店，1990），卷三，頁 74。江藩治學雖宗漢學，但對宋儒修身的功夫卻頗推服「學者治經宗漢儒，立身宗宋儒，則兩得矣」、「本朝為漢學者，始于元和惠氏，紅豆山房半農人手書楹帖云：『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不以為非，且以為法，為漢學者背其師承何哉！藩為是記，實本師說。」

<sup>82</sup> 紀昀，〈丙辰會試錄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149。

不以當時偏向於考據為主的漢學為滿足，因此也才会有譏諷漢學之弊的故事產生。而且從他對漢、宋學之弊同樣給予譏諷上看來，他能意識到漢、宋學的流弊，所以他的立論乃有破除門戶之見，各取所長，這樣突破漢、宋藩籬的主張。可惜的是，紀昀雖然重視實用之學，但仍未能突破專注於儒學的時代囿限，僅有限度地吸納西學。對於紀昀這些治學趨向，今論述於下：

### 一、「崇實黜虛」，重視實證、反對空談。

由上述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對講學家空談高論形象的刻畫，可以看出紀昀對講學家的譏諷和抨擊，是因為他認為理學易於產生空談、臆斷和無益於國計民生的流弊，「唯漢儒之學，非讀書稽古，不能下一語；宋儒之學，則人人皆可以空談。其間蘭艾同生，誠有不盡饜人心者，是嗤點之所自來」一語，可以看出他這種重視考據實證，反對空談高論的治學傾向。但也從這句話中的「蘭艾同生」，點出了紀昀是承認宋學也有所長，「《論語》《孟子》，宋儒積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斷非漢儒所及……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都是紀昀指出宋學的「蘭」，而他所抨擊的「艾」，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空談、臆斷和無益於國計民生這些宋學流弊。紀昀這種重視實證，反對空談高論的治學趨向，並非只針對宋學，「故余於漢儒之學，最不信《春秋繁露》、《洪範五行傳論》；於宋儒之學，最不信《河圖洛書》、《皇極經世書》」話中也透露出他對漢、宋儒者所倡的形而上學，其中唯心玄虛言論的不滿，這正是他「崇實黜虛」，重視實證理念的展現。此外，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中，雖然滿紙虛無飄渺的鬼狐之言，看似和他重視實證的主張相矛盾，但是紀昀主張鬼神的存在，還是有他自己親身見聞的實證經驗。除了紀昀的庭訓<sup>83</sup>和聽聞<sup>84</sup>外，他有親見回煞之事：「余嘗於隔院窗樓中，

<sup>83</sup> 如《如是我聞》：先姚安公……因誨昀曰：「儒者論無鬼，迂論也，亦強詞也」（前揭書，卷三，頁 191。）

<sup>84</sup> 如《如是我聞》：顧非熊再生事，見段成式《酉陽雜俎》，又見孫光憲《北夢瑣言》。其父顧況集中，亦載是詩，當非誣造。近沈雲椒少宰撰其母《陸太夫人志》，稱太夫人于歸，甫匝歲，贈公即卒。遺腹生子，恒週三歲亦殤。太夫人哭之慟曰：「吾之為未亡人也，以有汝在，今已矣！吾不忍吾家之宗祀自此而絕也。」於其斂，以朱志其臂，祝曰：「天不絕吾家，若再生以此為驗。」時雍正己酉十二月也。是月，族人有比鄰而居者，生一子，臂朱灼然。太夫人遂撫之，以為後即少宰也。余官禮部尚書時，與少宰同事，少宰為余口述尤詳。蓋釋氏書中，誕妄者原有，其徒張皇罪福，誘人施捨，詐偽者尤多。惟輪迴之說，則鑿然有證。司命者每因一人一事，偶示端倪，彰人道之教。少宰此事，即借轉生之驗，以昭苦節之感者也。儒者甚言無鬼，又烏乎知之？（前揭書，卷三，頁 186-187。）、《瀋陽續錄》：輪迴之說，鑿然有之。恆蘭臺之叔父，生數歲，即自言前身為城西萬壽寺僧。從未一至其地，取筆粗畫其殿廊門徑，莊嚴陳設，花樹行列。往驗之，一一相合。然平生不肯至此寺，不知何意。此真輪迴也。朱子所謂輪迴雖有，乃是生氣未盡，偶然與生氣湊合者，亦實有之。余崔莊佃戶商龍之子，甫死，即生於鄰家。未彌月，能言。元旦父母偶出，獨此兒在繖襪。有同村人叩門云：「賀新歲。」兒識其語音，遽應曰：「是某丈耶？父母俱出，房門未鎖，請入室小憩可也。」聞者駭笑。然不久夭逝。朱子所云，殆指此類矣。（前揭書，卷三，頁 524。）、



遙見其去，如白煙一道，出於竈突之中，冉冉向西南而歿，與所推時刻方向，無一差也。又嘗兩次手自啓鑰，諦視布灰之處，手跡足跡，宛然與生時無二，所親皆能辨識之，是何說歟？」<sup>85</sup>、「然回斂形跡，余實屢目睹之，鬼神茫昧，究不知其如何也」<sup>86</sup>、「余乞假養病北倉……忽見綵衣女子揭簾入，甫露面，即退出。疑為趁座妓女，呼僕隸遣去，皆云外戶已閉，無一人也。主人曰：『四日前有宦家子婦宿此卒，昨移柩去，豈其回斂耶？』」<sup>87</sup>；**親見婢女得罪灶神遭懲之事**：「余小時見外祖雪峰張公家，一司爨姬好以穢物掃入灶，夜夢烏衣人呵之，且批其頰，覺而頰腫成癰，數日巨如杯，膿液內潰，從口吐出，稍一呼吸輒入喉，嘔噦欲死，立誓虔禱乃愈。是又何說歟？」<sup>88</sup>；**親人臨終前異事**：明器，古之葬禮也，後世復造紙車紙馬。孟雲卿〈古挽歌〉曰：「冥冥何所須，盡我生人意。」蓋姑以緩慟云耳。然長兒汝侏病革時，其女為焚一紙馬，汝侏絕而復蘇曰：「吾魂出門，茫茫然不知所向，遇老僕王連生牽一馬來，送我歸，恨其足跛，頗顛簸不適。」焚馬之奴泣然曰：「是奴罪也，舉火時上實誤折其足。」又六從舅母常氏彌留時，喃喃自語曰：「適往看新宅頗佳，但東壁損壞，可奈何！」侍疾者往視其棺，果左側朽穿一小孔，匠與督工者尚均未覺也<sup>89</sup>、庚午四月，先太夫人病革時，語子孫曰：「舊聞地下眷屬，臨終時一一相見，今日果然。幸我平生尚無愧色，汝等在世，家庭骨肉，當處處留將來相見地也。」<sup>90</sup>；**親聞鬼哭事**：余在烏魯木齊，軍吏具文牒數十紙，捧墨筆請判曰：「凡客死於此者，其棺歸籍，例給牒。否則魂不得入關。」以行於冥司，故不用朱判，其印亦以墨。視其文鄙誕殊甚。余曰：「此胥役托詞取錢耳，啓將軍除其例。」旬日後，或告城西墟墓中鬼哭，無牒不能歸故也，余斥其妄；又旬日，或告鬼哭又近城，斥之如故；越旬日，余所居牆外，**魏魏**有聲（《說文》曰：**魏**，鬼聲），余尚以為胥役所偽；越數日，聲至窗外，時月明如畫，自起尋視，實無一人。同事觀御史成曰：「公

《灤陽消夏錄》：謂鬼無輪迴，則自古及今，鬼日日增，將大地不能容；謂鬼有輪迴，則此死彼生，旋即易形而去；又當世間無一鬼，販夫田婦，往往轉生，似無不輪迴者。荒阡廢塚，往往見鬼，又似有不輪迴者。表兄安天石，嘗臥疾，魂至冥府，以此問司籍之吏。吏曰：「有輪迴，有不輪迴。輪迴者三途：有福受報，有罪受報，有恩有怨者受報；不輪迴者亦三途：聖賢仙佛不入輪迴，無間地獄不得輪迴，無罪無福之人，聽其遊行於虛墓，餘氣未盡則存，餘氣漸消則滅。如露珠水泡，倏有倏無；如閒花野草，自榮自落，如是者無可輪迴。或有無依魂魄，附人感孕，謂之偷生。高行緇黃，轉世借形，謂之奪舍。是皆偶然變現，不在輪迴常理之中。至於神靈下降，輔佐明時；魔怪群生，縱橫殺劫。是又氣數所成，不以輪迴論矣。」天石固不信輪迴者，病痊以後，嘗舉以告人曰：「據其所言，乃鑿然成理。」（前揭書，卷五，頁91。）

<sup>85</sup> 《灤陽消夏錄》，前揭書，卷四，頁79。

<sup>86</sup> 《灤陽消夏錄》，前揭書，卷五，頁98。

<sup>87</sup> 《槐西雜誌》，前揭書，卷四，頁358。

<sup>88</sup> 《槐西雜誌》，前揭書，卷三，頁309。

<sup>89</sup> 《灤陽消夏錄》，前揭書，卷五，頁94。

<sup>90</sup> 《如是我聞》，前揭書，卷一，頁145。

所持理正，雖將軍不能奪也。然鬼哭實共聞，不得照者，實亦怨公。盍試一給之，姑間執讒慝之口。倘鬼哭如故，則公亦有詞矣。」勉從其議。是夜寂然。又軍吏宋吉祿在印房，忽眩仆，久而蘇，云見其母至。俄臺軍以官牒呈，啓視則哈密報吉祿之母來視子，卒於途也。天下事何所不有？儒生論其常耳。余嘗作《烏魯木齊雜詩》一百六十首，中一首云：「白草颼颼接冷雲，關山疆界是誰分。幽魂來往隨官牒，原鬼昌黎竟未聞。」即此二事也<sup>91</sup>，都是紀昀以其親身經歷或親友見聞，因此相信鬼神存在的例子。

## 二、經世思潮下趨向漢學的治學方法，但不以漢學為藩籬。

學界自明末逐漸興起「崇實黜虛」的主張，落實到經國濟世上，就是經世致用以救世濟民的思想。紀昀深受這種思潮的影響，從《閱微草堂筆記》的記述中，可以看到紀昀無論是辨傳聞、論藥理、說物性、談科技、決斷刑獄，都富有實證精神<sup>92</sup>，而他本人則是「三十以前，講考證之學；五十以後，領修祕籍，復折而講考證」<sup>93</sup>講求考證之學，並且講求「謝彼虛談，敦茲實學」、「務求為有用之學」<sup>94</sup>，也一再強調「以實心勵實行，以實學求實用」<sup>95</sup>、「讀書以明理，明理以致用也」<sup>96</sup>。所以他對漢學家徵實的考證治學方法是頗為讚賞的，「唯漢儒之學，非讀書稽古，不能下一語」<sup>97</sup>、「其學篤實謹嚴」、「其學徵實不誣」<sup>98</sup>，在《四庫全書總目》中「通經」、「黜虛」、「用世」等類的評語措辭，也可以看出崇實的指向<sup>99</sup>。因此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出現大量對講學家空談高論批評的形象描寫，也就不足為奇了。

<sup>91</sup> 《灤陽消夏錄》，前揭書，卷一，頁 17-18。

<sup>92</sup> 詳見王秋文，〈姑妄言之姑聽之？--試論「閱微草堂筆記」的實證精神〉，《國文天地》，20：6（2004 年 11 月），頁 61-65。另如《灤陽續錄》記紀昀窮數日之力，意圖再造宋代神臂弓之事，也可見紀昀的實學精神「宋代有神臂弓，實巨弩也，立於地而踏其機，可三百步外貫鐵甲，亦曰克敵弓。洪容齋試詞科，有〈克敵弓銘〉是也。宋軍拒金，多倚此為器。軍法不得遺失一具，或敗不能攜，則寧碎之，防敵得其機輪仿製也。元世祖滅宋，得其式，曾用以制勝，至明乃不得其傳，惟《永樂大典》尚全載其圖說。然其機輪一事一圖，但有短長寬窄之度與其牝牡凸凹之形，無一全圖，余與鄒念喬侍郎窮數日之力，審諦逗合，訖無端緒。」（前揭書，卷一，頁 499-500。）

<sup>93</sup> 紀昀，〈姑妄言之序〉，前揭書，頁 375。

<sup>94</sup> 《四庫全書總目》凡例，前揭書，頁 33。

<sup>95</sup> 《姑妄聽之》，前揭書，卷二，頁 410。

<sup>96</sup> 《姑妄聽之》，前揭書，卷四，頁 488。

<sup>97</sup> 《灤陽消夏錄》，前揭書，卷一，頁 10。

<sup>98</sup> 此二句見《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序》，前揭書，1997。

<sup>99</sup> 詳見曾紀剛，《四庫全書》之纂修與清初崇實思潮之關係研究---以經史二部為主的觀察一書附錄二，（台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頁 129-148。而《四庫全書》收錄的標準之一

因為認同漢學徵實的治學方法，所以講求考證的紀昀是趨向於漢學，而不滿流於空談的講學家。但是以徵實的考證方法，是要達到「讀書以明理，明理以致用也」，所以最終目的還是在於致用。如果只是沉湎於復古，導致泥古而食古不化，成為迂腐的學究，甚至陷入「儒者日談考證，講曰若稽古，動至十四萬言」這種繁瑣的考證弊病當中，紀昀也會毫不客氣地給予辛辣的諷刺，所以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才有譏諷揶揄那些讀書不通、不明世事，迂腐老學究的形象描寫。尤其當早期清代漢學家所提倡透過漢學治學方法，以回歸經典原義的精神逐漸被淡忘之後，導致學者沉溺於故紙堆中，窮年累月於字句的考證，經世風格逐漸淡化，清代漢學的流弊也逐漸浮現出來。以批評漢學最力的姚鼐為例，姚鼐對漢學流弊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認為漢學「守一家之偏」<sup>100</sup>，二是指責漢學為「穿鑿瑣屑」之學<sup>101</sup>，如果去除因為推崇程朱而對漢學攻擊的感情因素，平心而論，姚鼐對漢學的某些批評也並非全然無理，如說漢學「穿鑿瑣屑」，務為餽釘之學，甚至「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確實是說到了漢學的某些痛處。對此，紀昀其實也早已毫不避諱地指出漢學之弊「及其弊也拘」、「及其弊也瑣」<sup>102</sup>，甚至也發出「早年辛苦事雕蟲」<sup>103</sup>的感嘆。我們且看紀昀主持會試時，取士用心於「明理」、「考證」、「事功」、「通經致用」，或許可以看出紀昀是欲以考據以求明理，由明理以建事功，簡言之，縈繞在其心中的目標就是通經致用：

設科取士將使分治天下之事也。欲沿天下之事必折衷於理，欲明天下之理必折衷於經，……今之所錄，大抵以明理為主。其逞辨才、驚雜

---

也是「今所錄者率以考證精核、論辯明確為主」（《四庫全書總目》凡例，前揭書，上冊頁33。）

<sup>100</sup> 姚鼐批評道：「當明時，經生惟聞宋儒之說，舉漢、唐箋注屏棄不觀，其病誠隘。近時乃好言漢學，以是為有異於俗。夫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亦漢之俗學也，其賢也幾何？」（〈復孔搗約論禘祭文〉，《惜抱軒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5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六，頁47。）、「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妒，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贈錢獻之序〉，《惜抱軒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5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七，頁56。），這如同紀昀所說的「及其弊也拘」。

<sup>101</sup> 姚鼐批評道：「近時陽明之焰熄，而異道又興。學者稍有志於勤學法古之美，則相率而競於考證訓詁之塗，自名漢學，穿鑿瑣屑，駁難猥雜。其行曾不能望見象山、陽明之倫，其識解更卑於永嘉，而輒敢上詆程、朱，豈非今日之患哉！」（〈安慶府重修儒學記〉，《惜抱軒文集後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5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十，頁202。）、「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為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為量，以窺隙攻難為功，其甚者欲盡捨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寧非蔽歟！」（〈贈錢獻之序〉，《惜抱軒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5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七，頁56。），這如同紀昀所說的「及其弊也瑣」。

<sup>102</sup> 此二句見《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序》，前揭書，1997。

<sup>103</sup> 〈小憩三間房見壁上詩意互抵戲題二絕句〉，《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532。

學、流於偽體者不取，貌襲先正而空疏無物、割剝理學之字句而鉅釘剽竊、似正體而實偽體者亦不取，期無戾於通經致用之本意而已。<sup>104</sup>周公手定《周禮》，聖人非不講事功；孔子問禮、問官，聖人非不講考證，不通天下之事勢而坐談性命，不究前代之成敗而臆斷是非，恐於道亦未有合。「永嘉之學」或可與「新安」相輔歟？<sup>105</sup>

由此可知紀昀雖然認同漢學的治學方法，但也不以考據為限，因此也才會毫不客氣地指出漢學的流弊<sup>106</sup>，一如對宋學之弊，同樣都給予辛辣的譏諷。而在「通經致用」的思維下，讓他不再囿限於漢宋學的藩籬之中，轉而重視傳統儒學中「濟世」的一面，在講求「內聖」的理學家眼中，總帶有異端氣味的永嘉事功學派，紀昀卻頗有為之平反之辭：

永嘉之學，倡自呂祖謙，和以葉適及傅良，遂于南宋諸儒別為一派。朱子頗以涉于事功為疑。然事功主于經世，功利主于自私，二者似一而實二。未可盡斥永嘉為霸術。且聖人之道，有體有用；天下之勢，有緩有急。陳亮上孝宗疏所謂風痺不知痛癢者，未嘗不中薄視事功之病。亦未可盡斥永嘉為俗學也。<sup>107</sup>

在紀昀看來「聖人非不講事功」，講求外王經世之學，並不同於出於自私之心的功利主義，紀昀並非輕視道德，而是不認同心性派學者的輕視事功「夫儒者之學，明體達用。道德事業，本無二源，歧而兩之，殊為偏見」<sup>108</sup>，所以人品事業卓絕一時的范仲淹，就備受紀昀的推崇：

<sup>104</sup> 〈甲辰會試錄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148。

<sup>105</sup> 〈丙辰會試策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270。

<sup>106</sup> 如在乾嘉樸學大師惠棟的《左傳補注》提要中即揭示出惠棟考據學無法通經致用的弊端「蓋其長在博，其短亦在於嗜博。其長在古，其短亦在於泥古也。」（《四庫全書總目》，前揭書，上冊卷 29，頁 380。），又在《四庫全書總目》卷首三（凡例）也對顧炎武音學表達出不滿「聖賢之學，主於明體以達用，凡不可見諸實事者，皆屬卮言。儒生著書，務為高論，陰陽太極，累牘連篇，斯已不切人事矣。至於論九河則欲修禹跡，考六典則欲復周官，封建井田，動稱三代，而不揆時勢之不可行。至黃諫之流，欲使天下筆劄皆改篆體；顧炎武之流，欲使天下言語皆作古音，迂謬抑更甚焉。又如明之曲士，人喜言兵，《二麓正議》欲掘坑藏錐以刺敵，《武備新書》欲雕木為虎以臨陣，陳禹謨至欲使九邊將士人人皆讀《左傳》。凡斯之類，並闢其異說，黜彼空言，庶讀者知致遠經方，務求為有用之學。」（《四庫全書總目》凡例，前揭書，上冊頁 33），另如《槐西雜志》稱「故余於漢儒之學，最不信春秋繁露、洪範五行傳論」，前揭書，卷一，頁 251。

<sup>107</sup> 《永嘉八面鋒》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前揭書，下冊卷 135，頁 1781。陳亮上孝宗疏所言是「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龍川文集》提要引陳亮言，前揭書，下冊卷 162，頁 2157。）

<sup>108</sup> 《宋令懿範》提要，前揭書，上冊卷 61，頁 858。

蓋行求無愧於聖賢，學求有濟於天下，古之所謂大儒者有體有用，不過如此，初不必說太極、衍先天，而後謂之能聞聖道，亦不必講封建、議井田，而後謂之不愧王佐也。觀仲淹之人與仲淹之文，可以知空言、實效之分矣。<sup>109</sup>

《閱微草堂筆記》中黃山二鬼的質疑，其實也是紀昀對理學家薄視事功的質疑，尤其是身處乾隆盛世的紀昀，應該是深刻地體驗到治理一個龐大的帝國，這樣一件包羅萬象巨大的工程，需要許多非道德性的知識和技術，也就是「體國經野之政、捍災禦變之方」的「治法」、「政典」，光靠誠正修齊這一內聖經世連鎖推理法的道德訴求，恐怕會如費正清所說的「在希臘學者的眼裡，不過是一連串的如意算盤而已」<sup>110</sup>，這也是紀昀為何會重視事功，而對理學家熱衷於性理空談頗有微辭<sup>111</sup>的原因所在：

《西銘》論萬物一體，理原如是。然豈徒心知此理，即道濟天下乎？父母之於子，可云愛之深矣，子有疾病，何以不能療？子有患難，何以不能救？無術焉而已。此猶非一身也。人之一身，慮無不深自愛者，己之疾病，何以不能療？己之患難，何以不能救？亦無術焉而已。今不講體國經野之政、捍災禦變之方，而曰吾仁愛之心同於天地之生物，果此心一舉，萬物即可以生乎？吾不知之矣。至《大學》條目，自格致以至治平，節節相因，而節節各有其功力。譬如土生苗，苗成禾，禾成穀，穀成米，米成飯，本節節相因。然土不耕則不生苗，苗不灌則不得禾，禾不刈則不得穀，穀不舂則不得米，米不炊則不得飯，亦節節各有其功力。西山作《大學衍義》，列目至齊家而止，謂治國平天下可舉而措之。不知虞舜之時，果瞽瞍允若，而洪水即平、三苗即格乎？抑猶有治法在乎？又不知周文之世，果太姒徽音而江漢即化、崇侯即服乎？抑別有政典存乎？今一切棄置，而歸本於齊家，毋亦如土可生苗，即炊土為飯乎？<sup>112</sup>

<sup>109</sup> 《文正集》提要，前揭書，下冊卷 152，頁 2041。

<sup>110</sup> 費正清，《美國與中國》（台北：商務印書館，1987），頁 58。

<sup>111</sup> 早在紀昀 25 歲（1748）尚未登第時，便有〈瓦橋關〉憑臨弔古之詩，「積水通瀛海，雄關記瓦橋。當年爭洛閩，此外付金遼。世暗邊功賤，儒多戰氣銷。北盟誰載筆，猶忍話三朝」表達出對理學家議論多而事功少的不滿。（《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492）

<sup>112</sup> 《姑妄聽之》，前揭書，卷三，頁 453-455。

當然紀昀也才會不滿於漢學家泥古、瑣碎之弊，故而寫出泥古的劉羽沖，和譏諷漢學「儒者日談考證，講曰若稽古，動至十四萬言，安知冥冥之中，無在旁揶揄者乎？」的記述。

雖然紀昀治學重視著通經致用，但遺憾的是，仕宦一生可謂榮崇達於極至<sup>113</sup>的紀昀，位高官顯卻少顯赫的政績，以致自己也不免發出「余今老矣，叨列六卿，久無建白，平生恆內愧」<sup>114</sup>的長嘆。但細究其宦途之中，仍多致意於國計民生之舉，如甫成進士之時即留意於律法、吏治<sup>115</sup>，在謫居烏魯木齊時，為終身戍役之單丁請命，消彌禍患於未然<sup>116</sup>，當仕途漸居高位說話有份量時，自乾隆四十九年至嘉慶七年，共計有十六本替各地因蠲緩積欠稅賦的謝恩摺子<sup>117</sup>，可以看到紀昀為民請命的一面。紀昀最為人稱著的政績是「壬子（乾隆五十七年），以畿輔水災奏請截留宦糧萬石，設十廠賑饑。得旨，六月開廠，自夏季至明年四月，全活無算」<sup>118</sup>。而紀昀之所以會少有建樹，主要關鍵在於乾隆、嘉慶兩位皇帝對紀昀的看法，「學問素優」<sup>119</sup>、「文學尚優」<sup>120</sup>、「其派出之紀昀，本係無用之腐儒，

<sup>113</sup> 紀昀除了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到乾隆三十五年（1770）被謫戍烏魯木齊外，從乾隆四十四年（1779）出翰林入中樞，直到嘉慶十年（1804）病卒，紀昀曾三遷御史，三入禮部，兩次執掌兵符，最後以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加國子監事，並賜紫禁城騎馬，襄贊政事達二十餘年。

<sup>114</sup> 〈尹太夫人八十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225。

<sup>115</sup> 乾隆十九年有〈擬修定科律詔〉「滌濫除煩，法歸簡約。使民不易犯，吏不為奸」留心於律令、〈擬請重親民之官疏〉「且夫吏治易弛而難張，官方易淆而難澄。一不經心，其弊百出。方今清公守法，約己愛人者，守令之中，豈曰無人；然南山之竹，不揉自直，器車之材，不規自圓，此千百之一二耳。其橫者毛鷲搏噬，其貪者溪壑不盈，其譎者巧詐售欺，其懦者昏憤敗事，而貴族權門依勢作威者又錯出于其中，一二良吏，恐不能補千百人之患也。況此一二二人者，無所激勸，亦將隨而波靡哉。良由視之太輕，核之不力，而蠹政害民，勢遂至此也。」關注於吏治。（《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127。）

<sup>116</sup> 汪德鉞（1748-1808）稱「舊例，挈妻子謫遣於烏魯木齊者，五年後釋為民；單丁則終身戍役。乾隆庚寅（三十五年）夏，積多至六千人，頗相扇動。吾師具奏稿，請將軍巴彥弼上之，六千人同日脫籍。著為令，與挈眷者同限」，〈紀曉嵐師八十序〉，《四一居士文抄》，《稀見清人別集叢刊》第 12 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卷四，頁 332-333。

<sup>117</sup> 《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95-107。

<sup>118</sup> 錢儀吉纂，《碑傳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三十八，頁 1090，引朱珪〈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文達紀公昀墓誌銘〉。清史稿本傳稱「故事，五城設飯廠，自十月至三月。昀疏請自六月中旬始，廠日煮米三石，十月加煮米二石，仍以三月止，從之」（清史稿卷 267，列傳 107），「賑期向無在夏月者，此特恩也。後復增五廠，至癸丑四月始停止，所全活者無數」（汪德鉞，〈紀曉嵐師八十序〉，《四一居士文抄》，《稀見清人別集叢刊》第 12 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卷四，頁 332-333。此事被稱為「特恩」是因為有異於舊例，賑期加長、賑饑粥廠加多、加煮賑米，所以受惠災民也更多，應該是乾隆對紀昀的恩准。

<sup>119</sup> 乾隆三十三年（1768），紀昀授貴州都勻府知府，乾隆立即下諭以四品銜，仍留庶子任。理由就如嘉慶〈御賜碑文〉中所說的「遂荷先帝特達之知，獨蒙學問素優之譽。一麾出守，劇任恐掩佳才，四品加銜，殊恩特邀破格」（《紀曉嵐文集》第三冊，前揭書，頁 723），在此可以看出乾隆對紀昀學問的賞識。

原不足具數，況伊於刑名事件素非諳悉」<sup>121</sup>是乾隆對紀昀的看法，「紀昀讀書多不明理」<sup>122</sup>，則是嘉慶對紀昀的評語。從這些評語中可以確信紀昀的文學、學問是被乾、嘉二帝所肯定，但或許正因為紀昀在文學、學問方面傑出的表現，使得乾、嘉二帝不以幹吏視之，而讓他失去了「通經致用」在政事上表現的機會，徒生「叨列六卿，久無建白」之慨。

### 三、就學術思想而言，紀昀有些見解雖非首創，但仍不失為同時代中較先進的意見。

前文紀昀所指出的漢學泥古、瑣碎之弊，這樣的批評其實也曾出現在理學陣營中。但以被漢學陣營視為同路人的紀昀<sup>123</sup>有此言論，自然不同於漢宋兩陣營相訾時，會被視為攻擊挑釁的言論，對漢學陣營而言，產生自我反思的作用較大。一些治學廣博的漢學家如凌廷堪（1755-1809）<sup>124</sup>、焦循（1763-1820）、王引之（1766-1834）、段玉裁（1735-1815）等人都對漢學積弊有所反思，而意見也和紀昀大略相同，雖然沒有證據說明紀昀的意見影響過這些比他年少稍微後期的漢學家，但紀昀的意見，仍不失為同時代中較為先進的意見。以紀昀對惠棟泥古積習的不滿「其長在古，其短亦在於泥古」，王引之也有相同的意見，其論惠棟治

<sup>120</sup> 紀昀曾向乾隆提出軍國大政的建言時，遭乾隆斥曰「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實不過以倡優蓄之，汝何敢妄談國事！」（天嘏，《清代外史》，收入《滿清稗史》上冊（北京：中國書店，1987），頁20。）

<sup>121</sup> 乾隆五十年（1785）紀昀時任左都御史，因覆檢海升毆死其妻吳雅氏一案遭致乾隆呵斥「其派出之紀昀，本係無用之腐儒，原不足具數，況伊於刑名事件素非諳悉，且目系短視，於檢驗時未能詳悉閱看，即以刑部堂官所言隨同附和，其咎尚有可原，著交部嚴加議處」（《東華續錄》乾隆朝，王先謙編，《續修四庫全書》第37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101，頁772），此案因當事兩造具為權貴之姻，引起風波甚大，罰俸、革職者不少，乾隆於此雖明為呵斥，但仍有「其咎尚有可原」維護之意，但也可知紀昀「於刑名事件素非諳悉」。

<sup>122</sup> 《東華續錄》嘉慶朝，十月己卯上諭（王先謙編，《續修四庫全書》第37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一，頁384）。嘉慶元年大學士出缺，嘉慶帝就想擢升劉墉、紀曉嵐二人為大學士，但與太上皇乾隆一商量，太上皇卻不應允，可能是因為二人在內禪大禮時，貿然苦諫乾隆把傳國玉璽傳給嘉慶，因此得罪太上皇。嘉慶帝當時未能親政，只好按父皇的意願行事，因此才在上諭中這樣曉諭。

<sup>123</sup> 江藩《漢學師承記》卷六即為紀昀立傳。

<sup>124</sup> 凌廷堪指出漢學末流之弊為「浮慕之者襲其名而忘其實，得其似而遺其真。讀《易》未終，即謂王、韓可廢；誦《詩》未竟，即以毛、鄭為宗；《左氏》之句讀未分，已言服虔勝杜預；《尚書》之篇次未悉，已云梅賾偽《古文》，甚至挾許慎一編，置九經而不習；憶《說文》數字，改六籍而不疑。不明千古學術之源流，而但以譏彈宋儒為能事。所謂天下不見學術之異，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與胡敬仲書〉，《校禮堂文集》，《續修四庫全書》148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23，頁262。），未嘗不是紀昀所諷刺讀書不通的學究。此外，紀昀認同其兄紀昀的看法，他自稱「昀頗蓄妾媵」，這在當時「妾媵猶在禮法中」，或許這就是紀昀會主張用寬容的態度來看待情慾的原因，畢竟能達到不起心動念的人少，能「禮不可逾，義不可負，能自制不行」，就難能可貴了，嚴格的禁止恐怕只會「必激而蕩於禮法外矣」（〈伯兄晴湖公墓誌銘〉），產生更多的假道學罷了，這樣的觀點也和凌氏提倡以禮節欲觀點頗為相似。

學泥古的積習「考古雖勤……見異於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sup>125</sup>，焦循也指出「惟漢是求，而不求其是，於是拘於傳注，往往扞格於經文。是所述者，漢儒也，非孔子也。而究之漢人之言，亦晦而不能明」<sup>126</sup>。紀昀所譏諷「儒者日談考證，講曰若稽古，動至十四萬言，安知冥冥之中，無在旁擲揄者乎？」漢學的瑣碎之弊，段玉裁晚年自稱：「喜言訓詁考核，尋其枝葉，略其根本，老大無成，追悔已晚」<sup>127</sup>除了是自謙外，也未嘗不是對漢學瑣碎之弊的反思。

紀昀另一通經致用的學術思想，雖然是前有所承並非獨創，但是在乾嘉「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東漢古文經學如日中天時，經世取向已逐漸為士人所淡忘，尤其是時為乾隆盛世，西洋外患未至，太平天國內憂未顯，仍念茲在茲於經世思想，仍能將眼光看向訓詁考證之外，當屬不易。和紀昀同時代的今文學家莊存與（1719-1788）主張專明大義以求致用、章學誠（1738-1801）提倡經世致用的治學風尚、陸燿（字青來，1723-1785）編纂《切問齋文鈔》宣導經世學風<sup>128</sup>，同樣都有重視經世的言論，雖無證據說明彼此間有無互相影響，但都能有超脫時代風潮的意見，可說是英雄所見略同。而能知漢學之弊又為求通經致用，自不能以漢學為藩籬，紀昀乃有破除門戶之見，各取所長的主張。在當時有這樣的見解也不是紀昀一人而已<sup>129</sup>，乾嘉之後，學術思潮逐漸有漢宋調和、漢宋兼采、漢宋會通、漢宋兼容等等主張，紀昀所言未嘗不是走在風氣之先，同時他的主張也是有助於推動這樣的趨勢，而這項工作的進行，則落在紀昀的門生阮元（1764-1849）身上。阮元自稱「元以科名出公門生門下，初入都，公見元所撰書，稱許之。自入詞館，聞公議論益詳。蓋公之學在於辨漢宋儒術之是非，析詩文流派之正偽」<sup>130</sup>，在「聞公議論益詳」的耳濡目染薰陶下，日後成為政壇高官、學界領袖的阮元，也曾主張「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

<sup>125</sup> 〈與焦里堂先生書〉，《王文簡公文集》，王引之，《續修四庫全書》1490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四，頁 392。

<sup>126</sup> 〈述難四〉，《雕菰樓集》，焦循，《續修四庫全書》1489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七，頁 175。

<sup>127</sup> 〈博陵尹師所賜朱子小學恭跋〉，《經韻樓集》，段玉裁，《續修四庫全書》1435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八，頁 76。

<sup>128</sup> 陸燿和紀昀少年時都受教於董邦達（1699-1769），兩人甚有交情。陸燿輯錄清初至乾隆年間有關「風俗之盛衰、吏治之得失、民生之疾苦」的言論而成《切問齋文鈔》一書，該書上承晚明陳子龍等人的《皇明經世文編》，下啟晚清魏源等《皇清經世文編》，所秉持崇實黜虛的宗旨，與《四庫全書總目》「以實學求實用」遙相呼應。因此周積明認為從歷史記載來看，紀昀「刪定」《四庫全書總目》與陸青來編纂《切問齋文鈔》是兩項並未發生任何關聯的文化活動，然而在「崇實黜虛」的經世意趣上，兩者卻表現出不謀而合的共通性。（周積明，〈紀曉嵐與陸青來——兼論十八世紀經世思潮〉，《清史研究》第 4 期，1993 年）

<sup>129</sup> 如小紀昀四十多歲的王引之也曾說「熟於漢學之門戶，而不囿於漢學之藩籬」（〈經義述聞序〉，《王文簡公文集》，《續修四庫全書》1490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三，頁 383。）

<sup>130</sup> 《紀曉嵐遺集》序，阮元，《紀曉嵐文集》第三冊，前揭書，頁 727。



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誚也」<sup>131</sup>這樣的持平之論，他主持編纂的《國史儒林傳》對漢、宋學者較能兼收並重，其幕府也是漢、宋學者並存的場所，他的幕下江藩（1761-1831）寫成《漢學師承記》，而方東樹（1772-1851）則將深詆漢學的《漢學商兌》獻給他，有點希望他在漢、宋學的問題上主持公道的意味，這也說明了阮元兼采漢宋寬容的學術態度，已得宋學家的認可。所以龔自珍才下這樣一個綜論，認為其學「匯漢宋之全，拓天人之韜，泯華實之辨，總才學之歸」<sup>132</sup>。而阮元利用自身的名位和財力編印了大量的書籍，在編《皇清經解》時，就未將戴震立異於程、朱的代表作《孟子字義疏證》收入其中，除了不欲激起漢宋對立的用意外，其師紀昀當年將該書「攘臂而扔之」<sup>133</sup>背後的思想內涵，是否因此影響到阮元此舉呢？讓人不禁有如此的聯想。

#### 四、已能正視西學之長，惜未突破專注於儒學的時代圍限，雖講求實用之學，僅有限度地吸納西學，屬於「穴結」時代的代表人物。

自從明代萬曆年間耶穌會教士來華，西學隨即傳入中土，至乾隆時已歷時百餘年，《四庫全書》中即收錄西人著作 24 種，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也屢屢提及洋人事蹟與西學<sup>134</sup>，對西學有相當程度的認知。紀昀對西學的認知是「製作器物，實巧不可階」，但是教義「迄不能行」，而對西洋人的印象是「然觀其作事，心計亦殊黠」：

其推步星象，製作器物，實巧不可階；其教則變換佛經，而附會以儒理。吾曩往竊聽，每談至無歸宿處，輒以天主解結，故迄不能行，然觀其作事，心計亦殊黠。<sup>135</sup>

紀昀體認到西學「其制器之巧，實為甲於古今」因此「寸有所長，自宜節取」<sup>136</sup>，雖然還有著天朝老大的心態，不過仍能正視西學所長，願意「節取」。紀昀認知的西學之長以「測量步算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於民用，

<sup>131</sup> 〈國史儒林傳序〉，《學經室一集》，阮元，《續修四庫全書》1478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二，頁 548。

<sup>132</sup> 張鑒等撰、黃愛平點校，〈阮尚書年譜序〉，《阮元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274。

<sup>133</sup> 章太炎《釋戴》篇會記載著，當紀昀看到一向與之交好的戴震所著的《孟子字義疏證》後，竟「攘臂而扔之」，可見他憤怒的程度，認為該書「以誹清淨潔身之士，而長流汗之行」，《章太炎全集》第四冊〈釋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頁 123。

<sup>134</sup> 提到的傳教士如利瑪竇、南懷仁、艾儒略等，也提到《坤輿圖說》、《職方外紀》、《西學凡》等西人著作，其中更以千餘字篇幅論述艾儒略之《西學凡》一書（《槐西雜老》，前揭書，卷二，頁 293-294）。

<sup>135</sup> 《如是我聞》，前揭書，卷四，頁 229。

<sup>136</sup> 《奇器圖說》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前揭書，上冊卷 115，頁 1529。

視他器之徒矜工巧為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講水利者所必資也」<sup>137</sup>，讓紀昀願意「節取」主要是著眼於國計民生，和他重視致用以利民生的主張是相符的。至於西學所傳的洋教，紀昀則是認為「其教則變換佛經，而附會以儒理」，以「傳天主之教者執國命」是「炫惑人心」、「悖亂綱常，莫斯為甚」，透露出對西人以教領政的深拒：

西學所長在於測算，其短則在於崇拜天主以炫惑人心。所謂自天地之大，以至蠕動之細，無一非天主所手造，悠謬姑不深辨，即欲人捨其父母，而以天主為至親；後其君長，而以傳天主之教者執國命，悖亂綱常，莫斯為甚。<sup>138</sup>

因此總而言之，當時朝廷對西學「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的態度，紀昀是贊同的，「歐羅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製作之巧，實逾前古。其議論夸詐迂怪，亦為異端之尤。國朝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具存深意」<sup>139</sup>，這也是身處十八世紀的中國，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提出的一個因應的方案，是在西方列強侵略中國前夕，作出最初的反應。這一主張可算是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派和馮桂芬、鄭觀應等早期改良派所提出的「中體西用」論的先聲。

紀昀也觀察到西方科技勝於中土，是由於講求實證、重測驗。「其國俗好語精微，凡事皆刻意研究」<sup>140</sup>、「其言皆驗諸實測，其法皆具得變通」<sup>141</sup>、「測驗增修，愈推愈密」<sup>142</sup>、「分曹測驗，具有實證」<sup>143</sup>，可見紀昀所觀察到西人這種講實證、重測驗，是已經掌握了科學中求真、求善的精神內涵。可惜的是，紀昀未能將西人這種講實證、重測驗的精神，倡導於當時的中國，畢竟紀昀的思慮盡瘁於儒學之中，且無法超越於時代的囿限。其次，紀昀雖富有實證的精神，但可惜的是因為對洋人的疑慮與防範，讓他錯失了一次科技交流的機會。《灤陽續錄》卷一記紀昀曾窮數日之力，意圖依照《永樂大典》所載，再造宋代神臂弓不成，欲「使西洋人料理之」，但為其師劉統勛（1700-1773）所止：

先師劉文正公曰：「西洋人用意至深，如算術借根法，本中法流入西域，故彼國謂之東來法。今從學算，反秘密不肯盡言。此弩既相傳利

<sup>137</sup> 《泰西水法》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前揭書，上冊卷 102，頁 1325。

<sup>138</sup> 《天學初函》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前揭書，下冊卷 134，頁 1762。

<sup>139</sup> 〈子部雜家類存目〉案語，《四庫全書總目》，前揭書，上冊卷 125，頁 1674。

<sup>140</sup> 《西儒耳目資》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前揭書，上冊卷 44，頁 598。

<sup>141</sup> 《乾坤體義》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前揭書，下冊卷 106，頁 1390。

<sup>142</sup> 《周髀算經》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前揭書，下冊卷 106，頁 1386。

<sup>143</sup> 〈天文算法類〉序言，《四庫全書總目》，前揭書，下冊卷 106，頁 1385。

器，安知不陰圖以去，而以不解謝我乎？《永樂大典》貯在翰苑，未必後來無解者，何必求之於異國？」余與念喬乃止。<sup>144</sup>

如果有一次「使西洋人料理之」的經驗，是愉快而且成功的，或許曾任兵部侍郎、兵部尚書的紀昀，會為中國武器的發展，做出重大的貢獻也未為可知<sup>145</sup>。當然這只是臆測之詞，可以肯定的是「他一生重要的業績，乃是立足於古典文化的「穴結」點，以睿智、深徹的眼力掃視中國滾淌千年的學術文化長流，進而作出涵蓋經學、哲學、文學、史學各科領域的規模恢宏的理論總結」<sup>146</sup>，綜觀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對儒者形象的刻畫，背後有著對儒學傳統進行修正以達到完善的用意，有著對漢宋學之爭作總結的意味。雖然在思想上他不是一個開創時代風潮的人物，但他對傳統文化有全面反省和總結的用心，因此稱之為「古典文化穴結時代的代表性人物」<sup>147</sup>是當之無愧的。

## 伍、結論

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對儒者形象的刻畫，其實也正是他治學趨向的反映。寫出講學家空談高論的形象，正反映出紀昀崇漢學考據方法的實；而黜宋學空談先天、心性之虛的治學趨向。寫出食古不化、迂腐學究的形象，正反映紀昀出對儒者陷入訓詁泥淖的譏諷，表達出紀昀「通經致用」的主張，也正是經世思潮下，他趨向漢學，但不以漢學為藩籬的治學方法。因此，對於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中儒者形象的探討，是有助於釐清紀昀未曾言明和被人誤解的治學趨向。綜觀上述所言，歸納出下列兩點結論：

<sup>144</sup> 前揭書，頁 500。

<sup>145</sup> 雖然紀昀對殺人利器還存著有傷陰德的觀念，《滌陽續錄》卷一中有一則這樣的記載「戴遂堂先生諱亭，姚安公癸巳同年也。罷齊河令歸，嘗館余家。言其先德本浙江人，心思巧密，好與西洋人爭勝，在欽天監與南懷仁杵（懷仁，西洋人，官欽天監正），遂徙鐵嶺，故先生為鐵嶺人。言少時見先人造一鳥銃，形若琵琶，凡火藥鉛丸，皆貯於銃脊，以機輪開閉，其機有二，相銜如牡牝，扳一機則火藥鉛丸自落筒中，第二機隨之並動，石激火出而銃發矣。計二十八發，火藥鉛丸乃盡，始需重貯，擬獻於軍營，夜夢一訶責曰：『上帝好生，汝如獻此器，使流布人間，汝子孫無嚆類矣。』乃懼而不獻。說此事時，顧其姪秉瑛（乾隆乙丑進士，官甘肅高臺知縣）曰：『今尚在汝家乎？可取來一觀。』其姪曰：『在戶部學習時，五弟之子竊以質錢，已莫可究詰矣。』其為實已亡失，或愛惜不出，蓋不可知，然此器亦奇矣。」（前揭書，頁 499）不過從他研究宋代神臂弓來看，他對兵器也不是全然排斥。

<sup>146</sup> 周積明，《紀昀評傳》導論（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頁 9-10。

<sup>147</sup> 周積明，《紀昀評傳》導論，前揭書，頁 1。

一、就儒者形象的描寫而言，無疑地是當相成功，以致於有「功魁罪首」般兩極化的評論。

由於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對理學末流之弊，種種的諷刺、揶揄深入人心，因此有人視其為漢學陣營「乾、嘉時代反程、朱的第一員猛將」<sup>148</sup>這樣功魁般的評價，也有人認為「近世氣節壞、學術蕪，大抵紀昀之罪也」<sup>149</sup>、「數百年風氣之衰，紀氏之過也」<sup>150</sup>這樣罪首般的評語，這都是因為書中的儒者形象刻畫成功所致，以致紀昀「揚漢抑宋」的印象深入人心。但實際上從《閱微草堂筆記》中對儒者形象的刻畫看來，不論是對理學淪為講章時文的不滿，因此加以揶揄；或是對儒者陷入訓詁泥淖的譏諷，這些食古不化，成為迂腐的學究，紀昀不論其為漢學、宋學，一律藉著鬼狐之口痛加抨擊和諷刺，可惜這樣的描寫卻為人所忽略，以致連帶著對紀昀的治學趨向也產生誤解。除《閱微草堂筆記》外，紀昀的許多言論也如同《閱微草堂筆記》中儒者形象的刻劃一樣，對漢宋學多持平之論，如他在〈周易義象合纂序〉中稱「古今說五經者，惟《易》最夥，亦惟《易》最多歧論甘者忌辛，是丹者非素，斷斷相爭，各立門戶，垂五六百年於茲」，對這種門戶之爭，紀昀以“水”做了一個生動的比喻：

余嘗與戴東原、周書昌言：「譬一水也，農家以為宜灌溉，舟子以為宜往來，形家以為宜砂穴，兵家以為宜扼拒，遊覽者以為宜眺賞，品泉者以為宜茶菴，泔澗者以為利浣濯：各得所求，各適其用，而水則一也。譬一都會也，可自南門入，可自北門入，可自東門入，可自西門入，各從其所近之途，各以為便，而都會則一也。《易》之理何獨不然。東坡《廬山》詩曰：『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通此意以解《易》，則《易》無門戶矣。紛紛互詰，非仁智自生妄見乎。」<sup>151</sup>

《易》學主象，主理、主事三派的紛爭，在紀昀看來實在是「仁智自生妄見」，因此他欣賞的是李東園於「漢學、宋學兩無所偏好，亦無所偏惡」這種持平之論，甚至發出「余向纂《四庫全書》，作經部詩類小序曰：『攻漢學者，意不盡在於經義，務勝漢儒而已；伸漢學者，意亦不盡在於經義，憤宋儒之詆漢儒而已。出爾反爾，勢于何極。』安得如君者數十輩與校定四庫之籍也」的感慨，由此也可

<sup>148</sup>如余英時即稱紀昀為「乾、嘉時代反程、朱的第一員猛將」，《論戴震與章學誠》（台北：華世書局，1980），頁 106。

<sup>149</sup>《新學偽經考》三上，康有為，《續修四庫全書》179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497-498。

<sup>150</sup>《紀昀評傳》引平等閣主人（狄葆賢）加批《閱微草堂筆記》評語，周積明（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 168。狄氏所批有正書局於 1922 出版，筆者惜未見。

<sup>151</sup>紀昀，〈周易義象合纂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153-154。

以看出紀昀致力於平息漢宋學門戶之爭，力求公允之論的用心。相同的意見又見於〈黎君易注序〉：

漢《易》言數象，不能離存亡進退，非理而何；宋《易》言理，不能離乘承比應，非象數而何。而顧曰：言理則棄象數，言象數即棄理，豈通論哉！余校定秘書二十餘年，所見經解，惟《易》最多，亦惟《易》最濫，大抵漢《易》一派，其善者必由象數以求理；或捨理者，必流為雜學。宋《易》一派，其善者必由理以知象數，或捨象數者，必流為異學。其弊一由爭門戶，一由驚新奇，一由一知半解，沾沾自喜，而不知《易》道之廣大，紛紜膠轕，遂曼衍而日增，殊不知《易》之作也，本推天道以明人事，故六十四卦之大象，皆有君子以字，而三百八十四爻，亦皆吉凶悔吝為言，是為百姓日用作，非為一二上智密傳微妙也；是為明是非決疑惑作，非為讖緯機祥預使前知也。故其書至繁至蹟，至精至深，而一一皆切於事。既切於事，即一一皆可推以理。理之自然者明，則數之必然、象之當然，割然解矣。又何必曰此彼法、此我法、此古義、此新義哉！<sup>152</sup>

在紀昀看來，漢宋《易》學象、數、理三派之爭的由來「一由爭門戶，一由驚新奇，一由一知半解」，但「漢《易》言數象，不能離存亡進退，非理而何；宋《易》言理，不能離乘承比應，非象數而何」，因此「言理則棄象數，言象數即棄理，豈通論哉！」，又何必堅持「此彼法、此我法、此古義、此新義」的門戶之見呢！在此不難看出紀昀辨二學之長短，並未袒護任何一方，主張的是消融門戶之見，以學術之是非為準，持論務得其平。

## 二、被忽略的「屏除門戶，一洗糾紛」治學傾向。

正如前文所言，紀昀趨向漢學，但不以漢學為藩籬的治學態度，以及對漢宋學諸多持平之論，可惜竟不能引起眾人的注意，遂致使紀昀有「反程、朱的第一員猛將」般的評價。事實上，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紀昀刻劃出講學者近名好勝的形象<sup>153</sup>，可以看到紀昀對門戶之爭的惋惜與痛恨。因此紀昀對漢、宋二學門

<sup>152</sup> 〈黎君易注序〉，前揭書，頁155。

<sup>153</sup> 紀昀對講學家近名好勝形象的描寫，將這種門戶之爭，以短短幾句話的故事，寫出講學家間的爭鬥，至死不休，甚至下徹黃泉，深刻地刻畫出講學家近名好勝的形象來：「嘉祥曾英華言：一夕秋月澄明，與數友散步場圃外，忽旋風滾滾，自東南來，中有十餘鬼，互相牽曳，且毆且詈，尚能辨其一二語，似爭朱陸異同也。門戶之禍，乃下徹黃泉乎？」（《槐西雜誌》卷二）或許是紀昀對講學家近名好勝形象譏諷的太鞭辟入裏了，所以梁啟超還曾怪罪紀昀道「學會之亡起於何也？曰：『國朝漢學家之罪，而紀昀為之魁也』，漢學家之言曰，今人但

戶之分<sup>154</sup>，或是唐、宋詩之爭<sup>155</sup>，多持平之論，故而徐世昌（1854-1939）在《清儒學案》中評論紀昀為「持論屏除門戶，一洗糾紛」<sup>156</sup>，阮元（1764-1849）也說紀昀「考古必衷諸是，持論務得其平……蓋公之學在於辨漢宋儒術之是非，析詩文流派之正偽」<sup>157</sup>。可惜的是，人們對此卻多忽視之。推究紀昀這些學術見解，未能引起眾人注意之因有二：其一是對漢宋學之弊，描寫的比例失衡。寫宋學之弊的篇數甚多，而寫漢學之弊的篇數則太少；寫假道學的篇章多<sup>158</sup>，寫真君子的篇章少<sup>159</sup>，於是讓人產生「揚漢抑宋」的錯覺。其二是紀昀未有學術專論以闡述其理念，著述又未刻意保留，散佚甚多<sup>160</sup>，其孫樹馨搜輯而成的《紀文達公遺集》，

著書，不尚講學」（《中國文化史》第 4 冊引梁啟超《時務報十·變法通義》言，陳登原，世界書局，1971，頁 251。）

<sup>154</sup> 如《灤陽消夏錄》卷一中經香閣的故事中，紀昀就以長篇大論一談他對漢宋學的持平之論：夫漢儒以訓詁專門，宋儒以義理相尚，似漢學粗而宋學精。然不明訓詁，義理何由而知？概用詆誹，視猶土苴，未免既成大輅，追斥椎輪，得濟迷川，遽焚寶筏。於是攻宋儒者，又紛紛而起故。余撰《四庫全書·詩部總序》，有曰：「宋儒之攻漢儒，非為說經起見也，特求勝於漢儒而已。後人之攻宋儒，亦非為說經起見也，特不平宋儒之詆漢儒而已。」韋蘇州詩曰：「水性自云靜，石中亦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此之謂矣。平心而論，《易》自王弼始變舊說，為宋學之萌芽，宋儒不攻；《孝經》詞義明顯，宋儒所爭，只今文古字句，亦無關宏旨，均姑置勿議；至《尚書》、三禮、三傳、《毛詩》、《爾雅》諸注疏，皆根據古義，斷非宋儒所能；《論語》《孟子》，宋儒積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斷非漢儒所及。蓋漢儒重師傅，淵源有自；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漢儒或執舊文，過於信傳；宋儒或憑臆斷，勇於改經。計其得失，亦復相當。

<sup>155</sup> 如同對漢宋之爭的辨正，紀昀用了很多的精力，要去矯正祖唐祧宋兩派詩論的偏頗，希望能於兩派之中取其長而棄其短。我們看他評點整理過的書，便可以知道為何他喜歡對一些有爭議的詩集加以評點和圈閱。如方回的《瀛奎律髓》、李商隱的《玉谿生詩集》，馮舒、馮班批閱的《才調集》等，又有評點校正《玉臺新詠》，這些詩集，前人都有爭議和不同評價，於是他也通過評點來提出自己的看法。主要評點著作有《瀛奎律髓刊誤》、《玉谿生詩說》、《刪正二馮先生評閱才調集》、《唐人試律說》、《紀曉嵐墨評唐詩鼓吹》等。此外，他對杜甫、蘇軾、陳師道、黃庭堅等人的詩作也曾作過評點。可見紀昀對這些書的評點，正是有意圍繞對此兩派的評價而開展的。這些大規模的評點，雖然在評點中沒有明確、集中地提出自己的論詩主張，但通過他對這幾種詩集評本的選擇和再評點，是可以看出他的論詩態度是：不要像方回那樣以江西詩派為尊，也不要像錢謙益、二馮那樣以晚唐詩歌為尊，而應該相容並蓄，博采各家之長。詳參〈紀昀詩論的時代背景與特色〉一文，王鵬凱、黃瓊誼，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 70 期（2007 年 7 月）。又如〈槐西雜誌〉卷四記鬼魂惋惜前後七子所引起的門戶之爭一事（《紀曉嵐文集》第二冊《閱微草堂筆記》（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頁 344-345）、〈灤陽消夏錄〉卷三鬼魂調停趙執信和王漁洋兩家詩說（前揭書，頁 57）都是紀昀對消弭文學門戶之爭的意見表達。

<sup>156</sup> 〈獻縣學案〉，《清儒學案》第 4 冊，徐世昌，世界書局，1962，卷 80，頁 1。

<sup>157</sup> 《紀曉嵐遺集》序，阮元，《紀曉嵐文集》第三冊（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頁 727。

<sup>158</sup> 如《如是我聞》卷四，前揭書，頁 219 記載的老儒、《如是我聞》卷四，頁 221-222 所載的老儒、《灤陽消夏錄》卷四，頁 81 所載的耆儒、《灤陽消夏錄》卷一，頁 11 所載的訓導、《姑妄聽之》卷二，頁 421 所載的講學者、《灤陽消夏錄》卷三，頁 41-42 所載的老儒、《灤陽消夏錄》卷四，頁 81 所載的兩塾師。

<sup>159</sup> 如註 13、14 提到的周姓老儒和魏環極。

<sup>160</sup> 紀昀不願從事學術著作的心態應是「自校理秘書，縱觀古今著作，知作者固已大備，後之人竭盡其心思才力，不出古人之範圍」（陳鶴，《紀文達公遺集》序，《紀曉嵐文集》第三冊，

又以晚年之作爲多，且偏重於應酬皇帝詩文，讓我們無法一探紀昀學術理念的全貌<sup>161</sup>。關於第一點，或許因爲當時正是漢學昌盛時期，漢學的流弊尙未顯露，紀昀雖然已看出些端倪，但畢竟和盛行數百年的理學所產生的弊端要少些，尤其是社會上假道學遠遠地比真君子要來得多，例子俯拾皆是，自然在篇章數量上會有懸殊的差距。關於第二點，只能有賴日後更加辛勤地整理文獻資料，以期有更多的資料來加以佐證。

---

前揭書，頁 729) 和「說者謂公才學絕倫，而著書無多，蓋其生平精力，已畢萃於此書（《四庫全書總目》）矣」（《紀曉嵐文集》第三冊，前揭書，頁 513 附錄引陸敬安《冷廬雜識》卷 1 言）；而文稿又不甚保留「生平未嘗著書，間爲人做序記碑表之屬，亦隨即棄擲，未嘗存稿」（陳鶴，《紀文達公遺集》序，《紀曉嵐文集》第三冊，前揭書，頁 729）。

<sup>161</sup> 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前言「收在《遺集》中的詩文，大約十不足一，這由他同時代人的記述，尤其是朋友和門人的回憶中可以得到證實。《遺集》所收，晚年之作居多，而壯年尤其是青年時代的作品卻甚少。這固然是因爲後人搜集先人的作品，晚年之作易見而青壯年之作難得，也可能因爲紀樹馨以爲那些應酬上層人物尤其是應酬皇帝的詩文，乃是自家先人的最高榮寵，故《遺集》收之甚多，而那些戀人思友、抒情喻志、贊花月之美好、抒情中之忿懣的真情之作，尤其是描寫世態、諷刺社會醜惡的篇章，則收之甚少。譬如，不少的同代人都說他曾作《京官詩》數十首，而只存一首諷刺詩《小軍機》賴清人筆記以存，《遺集》則不一見。由於紀樹馨的去取標準所致，給讀《遺集》的讀者一個印象，似乎紀曉嵐只會寫那些拍皇帝老子馬屁的詩文。公允地說，據此描繪紀曉嵐的形象，是不完整、不全面的。」（《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1）

## 參考文獻

### 專著

- 王先謙編，《東華續錄》，《續修四庫全書》第 373、37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 王引之，《王文簡公文集》，《續修四庫全書》149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皮錫瑞，《經學歷史》（台北：鳴宇出版社，1980 年）。
- 江藩，《經解入門》（天津：天津市古籍書店，1990 年）。
-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台北：華世書局，1980 年）。
- 汪德鉞，《四一居士文抄》，《稀見清人別集叢刊》第 12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
- 阮元，《擘經室一集》，《續修四庫全書》147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
- 周積明，《紀昀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 年）。
- 紀昀，《紀曉嵐文集》，孫致中等校點（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 年）。
-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 姚鼐，《惜抱軒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 145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笑嘏，《清代外史》，《清代野史》第一輯（成都：巴蜀書社，1988 年）。
-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
- 段玉裁，《經韻樓集》，《續修四庫全書》143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焦循，《雕菰樓集》，《續修四庫全書》148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張鑒等撰、黃愛平點校，《阮元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 凌廷堪，《校禮堂文集》，《續修四庫全書》148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水牛出版社，1981 年）。
- 曾紀剛，《四庫全書》之纂修與清初崇實思潮之關係研究----以經史二部爲主的觀察一書（台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 年）。
- 費正清，《美國與中國》（台北：商務印書館，1987 年）。
-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 錢穆，《國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年）。



錢儀吉纂，《碑傳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顏元，《存學編》，《續修四庫全書》第94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韓非，《韓非子》（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

#### 期刊論文

王秋文，〈姑妄言之姑聽之？一試論「閱微草堂筆記」的實證精神〉，《國文天地》，20：6（2004年11月），頁61-65。

王鵬凱、黃瓊誼，〈紀昀詩論的時代背景與特色〉，《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70期（2007年7月），頁29-49。

周積明，〈紀曉嵐與陸青來一兼論十八世紀經世思潮〉，《清史研究》1993年第4期。

侯健，〈閱微草堂筆記的理性主義〉，《中外文學》，8卷1期（1980年6月），頁30-48。

# The Observations on Ji Yun's Academic Inclinations from the Images of the Confucianists in *Yuewei Cottage Notes*

*Peng-Kai Wang\**

## **Abstract**

From the images of the Confucianists depicted by Ji Yun in *Yuewei Cottage Notes*, I can see Ji Yun's praise and detestation for the Confucianists at that time; from his love and hatred, I can know Ji Yun's attitude towards Han and Song studies. Meanwhile, those images reflected the standard of academic value in his mind. By putting words in the mouth of ghosts and fairy foxes, Ji Yun frequently lashed and satirized those scholars that discoursed Neo-Confucianism with hollow words and high-sounding talk and pedants that were fettered by old conventions.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these stories, perhaps we can explore some of Ji Yun's thoughts that he kept in his mind and had not stated clearly, and understand his academic inclinations. Via the analysis, I discovered that Ji Yun, when comprehending the classics, upheld the solidness of textual critical approaches of Han studies, and disapproved of the hollowness and indulgence in empty talk of genesis and temperament in Song studies. That is on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search approaches of Ji Yun and Cheng-Zhu Neo-Confucianism. Ji Yun admired the approach of Han studies that emphasized the textual criticism and verification; however, the final target of understanding the true meanings of the classics (comprehending the classics) via textual criticism should be fulfilling the "practical purposes" of governing and benefiting the people and the world. If scholars who were fettered by old conventions

---

\* Lecture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n Ka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ust wallowed in restoring ancient ways, insisted on pedantic rules, and even sank into textual criticism's defects of being minute and complicated, Ji Yun would satirize them bitterly and bluntly. Consequently, Ji Yun's research attitude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comprehending the classics and attaining practical use was not equal to Han studies that laid particular stress on the textual critical approach at that time. I can only say that he had an inclination to the research attitude of Han studies, but was not confined by Han studies. Moreover, although Ji Yun's approach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Cheng-Zhu Neo-Confucianism, he could still recognize the advantages of Cheng-Zhu Neo-Confucianism, and held many fair arguments. However, it's a pity that people did not pay attention to those fair arguments.

**Keywords:** *Yuewei Cottage Notes*, Ji Yun, images of the Confucianists